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05期（民國108年9月），91-14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政治運動之底蘊與兩難
——以浙江各縣戰時政治工作隊為例（1938-1940）*

汪正晟**

摘　要

浙江省各縣戰時政工隊之設立，旨在發動熱血青年組訓民眾、協助戰時政務推動。然而縣政工隊不但無法有效配合戰時行政，反而衝擊且阻滯了基層政治與政務，與政府的預想大相逕庭。之後即使縣政工隊改組，省府仍是苦無善策。政工隊妨礙地方行政，除了檯面上各種明顯的主客觀因素之外，是否存在其他深層原因？本文深入解析當時政工刊物史料中反映的隊員工作情形、生活形態與政工心態。研究結果表明，青年受當代青年政治運動意識形態框架影響，而「政工生活」模式又促進青年政治運動，許多青年政工的自我想像凌駕了現實需求，他們以政治領袖自居，依照其理解的個體自由與主體性原則來認知並批判現實，且堅持改造的不妥協立場，以致徹底否定現存體制與權威，不惜訴諸體制外的激進運動路線，謀求自我與集體利益的同步實現。藉由觀察此一過程，或有助於了解國民黨何以最終喪失運用青年的可能。

關鍵詞：政工隊、青年政治運動、自我、政工生活、自由主義治理性

---

*　收稿日期：2018 年 4 月 2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 年 1 月 11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前　言

學界以往對於國民黨政治工作的研究，偏重於軍隊政工，以此解釋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此一取徑顯然受到中共「黨指揮槍」成功經驗的引導，已經獲致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1]對於軍隊政工以外的民眾政治工作，乃至政治工作本身的探討，則有待開展。[2]就呈現國共成敗的因由方面，民眾政治工作涉及的歷史面相其實不可或缺。準此，本文以抗戰初期浙江省戰時各縣政治工作隊驟起驟落之經過為例，解析其與青年政治運動之間的關係。[3]本文所謂「青年政治運動」，指的是建立在「青年創造時代」、代表「進步力量」之想像上的一整套政治認知與實踐框架。本文並嘗試藉此探討青年政治運動在中國現代政治中的樣態與影響，以期補充主流歷史敘述，從而對中國現代政治走向提出更為細緻的解釋。

除了一般習見之史料，如官方文書與事後回憶等，本文將大量參考當時各政工隊出版之刊物。以黃紹竑（1895-1966）《五十回憶》為代表的部分國民黨省政高層的回憶錄，儘管經常為史家引用，但在探討政工隊及青年政治運動這一新課題時，屬於事後撰成又較為簡略的官員陳述，有時不免避重就輕以自圓其說。此時，數量龐大的政工刊物，即因其產生於多個歷史現場，反映政工

1　相關研究見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民國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上冊，頁 31-101。王奇生，〈「武主文從」背景下的多重變奏：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政工與黨務〉，《抗日戰爭研究》，2007 年第 4 期，頁 60-82。

2　本文認為，學運的政治化是由學運內在邏輯所決定。此一觀點受到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從民國八年到民國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一書啓發。Chang-tai Hung（洪長泰）的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是研究抗戰青年下鄉宣傳工作必須參考的著作，但他的關注是（左翼）青年的文化下鄉與群眾啓蒙工作，而本文則主要考察青年政治運動的框架本身，可說從另一角度印證洪著的發現。

3　省直屬政工隊的活動範圍大，有敵佔區、近敵區與後方，比較複雜。游擊區的縣政工隊，直接與敵偽鬥爭，工作性質特殊，組織與工作方式，均與浙東頗有不同。本文討論之史料，以後方各「縣政工隊」為主，間或涉及省直屬政工大隊與游擊戰區各縣政工隊。

隊員即時的感受，保留未經掩飾的豐富細節，而具有補充、甚至修正少數高層官員單一視角的重大價值。因此，本文特別倚重這些當時出版的政工刊物，以求最大程度保留證據的多元與真實。

一、政工隊的構成與爭議

1940 年 6 月，浙江省政府訓令後方各縣，將所屬戰時政治工作隊，改編爲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青年服務隊。至此，困擾浙江政局長達兩年半的政工隊爭議，也隨著後者的實質解散告終。[4]在公文中，省主席黃紹竑特別鄭重其事地解釋了省府決策的原委：

> 本省各縣戰時政治工作隊制度，自二十七年一月創立以來，……實當倭寇肆虐，省會南遷之際。當時各縣行政，類呈靜止狀態，組織鬆弛，動力缺乏，本身已不足應戰時之需求，而一切措施，仍不出文書布告之舊式，……本主席為集結有志青年，增強政治動力計，遂有戰時政治工作隊之設，庶期熱血青年咸得在政府領導之下，法令範圍之內，

4 本次改編的 57 個縣政工隊，人員約 1,900 人，已佔全部員額 2,700 餘名之七成。留下的省縣政工隊，人數僅約 800 有餘（數月後縮減爲 600 餘人）。參〈省政府快郵代電（二十九年一月六日）：電各專員縣長規定各縣政工隊編制與經費標準附發各額表及歲出概算科目式樣電〉，《浙江省政府公報》，期 3197（1940 年 1 月），頁 28-31；〈三十年度游擊區各縣室隊編制名額經費標準〉，《新力》，卷 6 期 15（1940 年 2 月），頁 15；劉廣惠編，《浙西政略商討總紀錄》（於潛：浙西民族文化館，1940），行政、政工部分，頁 1-136；劉廣惠、孫慶會編，《浙西對敵戰鬥機構與幹部》（於潛：浙西民族文化館，1940），頁 16。縣政工隊改組，表面上是上層領導權易主，一樣的青年做著一樣的事。然而，浙江三青團的各縣青服隊，不能簡單等同改名後的政工隊。第一，在縣政工隊改組之前，即 1939 年，浙支團已成立服務隊，開始招收隊員幹部。其次，兩者工作內容相似，皆有推行政令與社會服務，不同處在於政工隊以政治進攻爲目標，以社會服務爲推進工作的輔助手段；而青服隊標榜服務社會之宗旨，其「服務綱要」中甚至有「勸止或糾正虐待牲畜禽獸」之項目。其三，三青團並非全盤接受政工隊員，而是先加甄別淘汰。此舉導致青服隊中原政工隊員的比例未能過半（不及 45%），而其他青服隊員的組成複雜，職業來源多樣化，包括農、商、學、教、軍、警、醫、工與黨團工作人員等。見宣鐵吾，〈宣主任訓詞──服務人員訓練班結訓典禮訓詞〉，《青年動態》，期 9（1940 年 11 月），頁 1-2。凡此種種，皆使青服隊之性質與政工隊大不相侔，某種程度上可能改變了號稱「青年」的特質。順帶一提，游擊區各縣政工隊與省隊也於 1941 年底結束。總之，青年服務隊不論在組織淵源、人員成分、任務性質、編制規模皆與政工隊大相逕庭，絕非後者改編更名之延續。

從事各種工作，矯正空想浮動之習，養成負責任守紀律之風；更本官師合一之旨，在工作中實施教育，立言行相符之規，以實踐證明理論。是以青年得有所歸，政府亦資其助。[5]

這段敘述表明，政工隊之成立，乃爲「集結有志青年，增強政治動力」。又曰政工隊兩年來「在政治上已發生極大之效用」，具有「工作上重大成就」，似乎已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年初，省府甫大張旗鼓推出以「建設浙東、收復浙西」，完成抗戰建國工作，實現三民主義新浙江宏猷的〈浙江省三年施政計畫綱領〉。作爲計畫基本實施單位的縣，正需要集中全力。何以卻不見（後方）縣政工隊在此擔任一定角色？[6]更有甚者，此一堂哉皇哉之官樣文章，並未提及政工隊成立以來即爭議叢生的事實。因而，不論是以「陶冶人才」爲其首要成就，或者「熱血青年咸得在政府領導之下，法令範圍之內」，還是「矯正空想浮動之習，養成負責任守紀律之風」，乃至「立言行相符之規，以實踐證明理論」等詞句，在時人、甚至當事人眼中，應當會覺得意味深長。

抗戰勝利後，黃紹竑出版了《五十回憶》。其中，黃紹竑輕描淡寫，以「不可避免」的「青年的幼稚病」，就將政工隊爭議一筆帶過。到此，政工隊更成了安頓救濟流亡失學青年，提供學習與報國管道的臨時措施。[7]似乎改組成青年服務隊不過是組織的進一步發展而已。然而，在 1938 到 1940 年的省府公文與公開講話中，黃紹竑對動員青年增強政治動力的企圖並無避忌，卻鮮少提及救濟流亡青年。那麼，從增強政治動力到救濟青年，此中轉折原因何在？黃紹竑有意無意言及的「青年幼稚病」，究竟是何意義？在這背後隱現的政工隊爭議又是什麼？欲瞭解全盤始末，有必要從杭州淪陷說起。

1937 年 12 月 24 日杭州淪陷，錢塘江以北的浙西地區大都爲日軍佔領。與杭州一江之隔的紹興，成爲浙東的最前線。大批難民渡江湧入，紹興籠罩在

5　浙江省政府，〈浙江省各縣政工隊兩年來之成就與改組爲各縣青年服務隊之緣由〉，《新力》，卷 5 期 13（1940 年 6 月），頁 15。此次改組不包括省直屬政工隊與游擊戰區各縣政工隊。

6　黃紹竑，〈政治工作隊之新任務：黃主席一月十五日對浙江省政府直屬各政工大隊訓詞〉，《民族》，期 10（1940 年 1 月），頁 21-22。

7　黃紹竑，《五十回憶》（上海：上海世界書局，1945），下冊，頁 408-409、411。

憂慮日軍乘勝追擊的恐慌氣氛中，包括一部分政府機關在內的本地人口開始撤離，紹興縣城與鄰近地區遂陷入市井蕭條、政務停擺的狀態，軍隊因而難以在紹興取得給養與支援。危局中，省主席黃紹竑任命親信賀揚靈（1901-1947）擔任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主持紹興鄰近各縣的抗敵工作。爲了盡速安定人心，恢復地方秩序與協助軍隊駐防，賀揚靈以青年幹部訓練班的名義，緊急招募了一批流亡紹興的青年，以承擔公務員的工作，俾使第三區署在最短時間內，具備執行各項戰時措施的能力。未幾，青年幹部訓練班更名爲第三區戰時政治工作隊，簡稱政工隊。第一期政工隊報考人數不多，錄取 60 人。訓練一個月後，大部分補充區署直轄的警察第一大隊，據此可知政工隊成立的原始意圖乃緊急補充行政人力。[8]

1938 年 3 月後，戰局重心轉移到魯南淮北，日軍渡江入侵紹興的可能性大爲降低。局勢既趨穩定，第二期政工隊於此時開辦，性質隨之產生轉變。相較於第一期以浙西流亡青年爲主，報考第二期政工隊的人數增至 500 多人，最後錄取 180 人，其中浙西與外省的青年僅 22 人，紹興人佔三分之一，加上來自第三區所屬縣份的成員，「合計就成爲倒壓的多數」。[9]也就是說，除了初創之際的極短時間，政工隊員主要是浙東本地人，而非流亡的外地失學青年。70%的學員是中學生或小學教員。這些人的學歷與熱情或許較高，組訓者卻已察覺，第一期隊員的政治素質卻更勝後期：由於家鄉陷落之痛，他們更願意獻身敵後工作。[10]第二期以後的政工隊員更傾向在本鄉從事喚起民眾抗戰意識的宣傳工作。[11]他們巡迴各鄉村，張貼標語，表演話劇，發動遊行與呼口號，並普遍組訓各種民眾抗敵團體。很快的，三區似乎就瀰漫著全民抗戰的濃烈氛圍。

8　三區直屬政工隊，〈三區直屬政工隊工作概要〉，《新力》，卷 2 期 2（1938 年 9 月），頁 5-9。

9　方元民，〈第三區戰時政工隊的發展過程〉，《錢江血潮》，輯 2（1938 年 12 月），頁 42。

10　胡雲翼，〈戰鬥二年來的三區政工隊〉，《戰旗》，期 64/65（1939 年 7 月），頁 20。方元民，〈第三區戰時政工隊的發展過程〉，《錢江血潮》，輯 2，頁 42。

11　結合本文使用的其他史料來看，第一期與第二期隊員在出身背景與工作意向上的分別，可能不限於紹興一帶，而是整個浙東各縣政工隊的普遍情形。

第一期政工隊尚在組訓之際，可能是賀揚靈等人的建議，浙江省政府於 1938 年 1 月下令，自省以降，包括行政督察區與各縣政府，一律成立戰時政治工作隊，成爲浙江地方行政體系中特有的編制，第一個縣政工隊成立於蘭谿。1938 年 9 月，集訓全省政工隊，浙江境內已有 60 個各級政工單位，超過 2,500 名政工人員。[12]以參加集訓的 329 名學員爲樣本，參加受訓者最大的 39 歲，最小的 17 歲，平均 22 歲。由於受訓者以隊長與幹部爲主，年齡一般較長，推測全體政工的平均年齡更低。表明青年無疑是浙江政工的絕對多數。

受訓政工平均學歷是高中一年級，三分之一以上曾任小學教師，其餘以肄業學生爲主。[13]說明幹部的來源大體屬於地方上的小知識分子。另據省抗衛會直屬政工隊訪問麗水、龍泉、雲和、松陽與遂昌五縣政工隊的報告，除麗水與龍泉稍好之外，其他各縣隊員平均學歷是高小。[14]考慮到雲和等縣原本偏僻窮困，當地青年政工的學歷也許較低，綜合推測，全體教育程度大概在初中到高小之間。

就其政治傾向而言：六分之一（53 人）曾爲國民黨員（現有黨籍者 23 人）、志願入黨者逾三分之一（118 人）、四分之一強信仰三民主義而不言國民黨（90 人），其他不正面作答（此題完全不答者 47 人）。另有 3 人表態不加入國民黨，1 人不加入任何黨。[15]據此，初入政工隊的青年，多半不排斥國民黨，甚至認同其理念。當此國共合作時期，加入國民黨固然受到鼓勵，不入黨卻也並無風險。換言之，此時青年政工大抵不必然討厭國民黨或支持共產黨，但所謂進步青年或思想左傾估計爲數不少。

根據省府的統計，縣政工隊結束之時，現有政工人數達 2,700 餘人，加上先前離隊約 3,000 人，合計招募青年政工已達 5,700 人以上。這些人平均在隊時間爲八個月，其中 40%的青年政工已轉任黨政軍各部門較高級工作，30%則

12　吳壽彭，〈政工隊集訓之開始與結束〉，《新力》，卷 2 期 7（1938 年 10 月），頁 9。
13　吳壽彭，〈政工隊集訓之開始與結束〉，《新力》，卷 2 期 7，頁 11。
14　直屬政治工作隊，〈訪問處屬五縣政工隊報告〉，《新力》，期 15（1938 年 6 月），頁 12。
15　吳壽彭，〈政工隊集訓之開始與結束〉，《新力》，卷 2 期 7，頁 11-12。

進入各高等院校、軍校繼續深造，尚有 20%則仍擔當各縣地方行政工作，只有不到 10%的人因爲能力太差而被當局主動剔除。[16]

進一步分析，平均在隊時間意義不大，但即使假設所有政工確實都在隊裡服務八個月，這也意味在兩年半的時間中，各縣政工隊已更替了三批以上不同的人馬，對工作的持續推進無疑十分不利。一份 1940 年初的記載指出：

> 有好些縣份，不僅隊長三易其人，甚至連原始隊員，……到現在跑得一個也不留。[17]

再看 40%（約 1,200 人）已在黨政軍機關從事所謂「較高級工作」，說明政工隊並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算是一條升遷的管道。另外有約 900 人「繼續完成高等教育」。鑑於他們離隊時間不長，原本應有高中程度。以此類推，那些轉往縣府其他部門的 700 人，可能已是初中高小的邊緣知識分子，最後還待在政工隊的人平均文化水平可能就更低了。再結合以下史料可以推測，政工隊員流動率相當驚人，到政工隊結束前夕，許多縣的情形恐怕都是如此：

> 在政工隊初成立時，各縣頗不乏優秀而能幹的青年參加，但是近來隊員水準卻有日益降低的趨勢。某些縣份政工隊員中連初中程度的人都很少，甚至有寫十句話也寫不週全的。[18]

從以上敘述，可以歸納出政工隊構成的三個特徵：首先，政工隊的主體是本地的中下層知識青年，並非外來的流亡青年。第二，隊員的流動性很高，整體素質日趨下降。第三、青年政工大致上願意替國民黨政權效力，不是共產黨支持者。照新昌縣長林樹藝（1906-1962）的描述：

> 他們是一群年在二十二歲左右，出身小康之家，很少家庭負担，初中畢業程度，缺乏處世經驗，純潔熱烈，可塑性大，而富於抗敵意識的青年男女。[19]

---

16 浙江省政府，〈浙江省各縣政工隊兩年來之成就與改組爲各縣青年服務隊之緣由〉，頁 15-16。
17 俞堅，〈政工隊諸問題的意見〉，《前方週報》，期 7（1939 年 8 月），頁 14。
18 林初，〈政工隊工作爲什麼會貧乏化？〉，《浙江潮》，期 91（1939 年 12 月），頁 755。
19 於樹巒等，〈我怎樣領導政工隊〉，《新力》，卷 5 期 1（1940 年 4 月），頁 33。

從這些特徵來看，政工隊員似乎符合當時中國智識青年的一般素質。他們無疑是最具有現代國家意識與政治參與意願的社會群體。或許因爲如此，浙江省當局最初幾乎不假思索，視動員熱血青年爲「增強政治動力」的不二法門。

但即使是政工隊的同情者，也只能說：「浙江政工隊和政工隊員所表現的一切，在社會上是毀譽參半。」[20]負責組建三區政工隊的方元民（1909-1949）便不禁批評道：

> 最嚴重的要算是我們的民眾的組織工作了。我們過去的活動，大部份是表現在宣傳鼓動方面……還嫌城市比重太大，鄉村工作太少。……熱情高漲，固然是好的現象，但是若不配以技術上的修養，……常常遭受複雜的社會人情所攻擊。[21]

紹興政工隊長劉廣惠也指出：

> 對象沒有切實的把握住，專注重中上層階級而忽略了下層的工作，在發動農工大眾參加抗戰的課題上當然專靠貼貼標語，散散傳單，是得不到多大的效果。……專注重形式而不重實際，例如：遊行、集會、演說，這些工作雖然不可缺少，但要再深入到切合民眾本身利害的問題，使他們多了解政治上的切身問題，不是更收到極大的效果嗎？[22]

主其事者都對政工隊的工作路線如此批評，其他官員的不滿可想而知。如第四區（金華附近十縣）專署秘書余遜齋（1877-1948）所點出：

> 講到政工隊的工作，我以為不外「發動民眾參加抗戰」八字，但我們看這一年來各縣的成績究竟怎樣？不是成效很少嗎？說到動員，只是官動而民不動，嘴動而事不動。在戰前，鄉村中本來呈著靜止的狀態，但經過了去年一年的動員工作，而動的人仍舊很少。[23]

---

20 阿楚，〈政工隊和政工隊員的面面觀〉，《龍游民眾月刊》，期 7（1940 年 2 月），第 7 版。
21 方元民，〈第三區戰時政工隊的發展過程〉，《錢江血潮》，輯 2，頁 60。
22 劉廣惠講，馬友勤記，〈紹興縣政工隊之歷史的回顧與展望──在集訓大隊的報告〉，《越王魂》，期 5/6（1939 年 2 月），頁 11。
23 〈浙江省第四區十縣政工室副主任政工隊隊長聯席會議特刊〉，《大風》，期 86（1939 年 3 月），頁 3。

省政工指導室凌潛夫也批評政工隊員散漫的工作態度：

> 而一般青年又都不慣於平凡的持久的去做打基礎的功夫，這件事厭倦了便掉換另一件，不管這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沒有，此一工作與彼一工作有關連沒有，更不管所做的工作與整個抗戰工作關係如何，以這樣的「突起的」「即興的」態度去零零碎碎的應付，如何能有系統，如何能深入？[24]

由此可見，政工隊最大的問題似乎在於：他們從事的宣傳流於浮面，並沒有眞正深入群眾、組織群眾，自然談不上發動群眾配合抗戰。僅就宣傳的效果而言，也往往是：

> 如果我們進一步去問牆壁上的許多標語與許多畫圖究竟是什麼意思？……這一切都是老百姓們至少是大部分的老百姓不能解答的問題。[25]

有許多主客觀因素導致這種宣傳至上的盲點。首先，青年政工一般屬於地方小知識分子群體，出身經濟狀況較好的家庭，生長在城市中或縣城裡，遠離農村，缺少與鄉下人打交道的實際經驗。其所謂宣傳，只會照搬城裡人傳達理念與知識的表述方式。再者，學生又是當時最易接受也最熱衷宣傳的群體。蓋現代意義上的宣傳，本質上是一種市場營銷，一向與大規模消費性閱讀人群與印刷傳播密不可分。雖然缺乏其他社會歷練與技能，受過現代教育者卻有生產及消費各類文宣產品的良好訓練。由於較實際的行政工作，青年政工一時之間難以參與或無力承擔，又急於貢獻一己之力，於是投身於自身最熟悉也最擅長的宣傳之中。此外，在抗戰初期，確實有宣傳動員民眾的客觀需求，而政府職員不論數量亦或質量都不敷所需。政工隊順理成章的擔負起這個任務，本該皆大歡喜。即使手法效果不盡完善，似屬情理之中。[26]

---

24 凌潛夫，〈浙江全省政工隊之回顧與前瞻〉，《新力》，卷 2 期 19（1939 年 1 月），頁 17。

25 余麟，〈政工隊應有的三點基本認識〉，《號角》，期 41（1940 年 3 月），頁 5。

26 即以開化政工隊爲例，有些隊員不通知學校，自行組織兒童隊上街晨呼、夜呼，就引起校方的不滿與質疑。〈開化政工隊第一次隊員大會及第三次座談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2（1939 年 9 月），頁 13。

然而，地方官員所期待於政工隊者，更多是因戰時而新增的繁劇業務，而這類政務需要深入基層，摸清楚每個村落，乃至家庭的實際情況，並隨時調整執行策略與方法。鄉鎮保甲長的工作能力普遍貧弱，亟需大量高素質人力的投入補強。偏偏在這一點上，青年政工所爲不但於事無補，反而造成縣級政府莫大的困擾。這才是政工隊廣受爭議之所在，有必要深入分析。

政工隊雖由省府設立，隊員領公家薪水辦公家事，但並非正式公務員，不得行使公權力。制度設計旨在運用政工隊協助戰時政務的推行。因此，政工隊員必須聽從官員的指導與調度。用政工隊員自己的話來說，他們是「有責無權」的「學徒」。[27]在此架構下，省政當局期望政工隊負起溝通政府與人民的責任，一方面使人民了解各項政令的意義而自願遵守，此即宣傳動員的部分；一方面要求政工隊在基層協助鄉鎮保甲長推動政務，順帶傳達民眾的需要與反映，使政府得以即時發現弊端改正錯誤，政令得到合理公平的落實。政工隊若欲補偏救弊，在地方組織普遍不夠健全的現實下，鄉鎮長（多半爲農村的權勢者）不免受其抨擊。於是政工隊員在基層政務學徒的助手地位之外，似乎疊加了上級監察特使的曖昧身分。

儘管如此，這並不妨礙地方官將政工隊員投入地方政務。他們的工作範圍，也幾乎涵蓋了所有地方政府的業務，甚至還包括一些「非典型」的服務。例如常山政工隊女隊員就得承擔鄉鎮兒童保育員的工作。由於許多人都把遺棄的女嬰送到她們那裡，照顧小孩反而成了主要事務，奪佔了其他抗戰工作的時間。[28]這反映出政工隊工作不力，部分縣府運用失當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但總體而言，在客觀戰時需求面前，大多數縣府都將政工隊投入以下中心工作：

> 召開保民大會，抽籤，組織保征兵協會，調查免緩役聲（申）請，查發出征軍人家屬優待費，複查戶口，調查食糧。[29]

---

27 楊鎮華，〈政工隊隊員的苦悶〉，《大風》，期 44（1938 年 7 月），頁 6。
28 〈常山政工隊第十次工作討論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10（1939 年 11 月），頁 9-10。
29 於樹巒等，〈我怎樣領導政工隊〉，《新力》，卷 5 期 1，頁 33。

這些項目皆由徵兵衍生，其中保民大會與徵兵的關係尤爲緊密，也是其他所有項目賴以開展的樞紐。保民大會是新縣制中的基層準民意機構，目的在將各項政令的推行辦法與疑難解決，在政府人員的指導說明下，交付保民討論公決後執行，從而達到凝聚民意，協助督促保甲長工作的效果。由於關係基層政務的推行，縣府又人力緊缺，難以兼顧，召開保民大會成爲政工隊的一大業務。理想中，憑藉著青年政工的大力宣傳與奔走，政工隊應該能夠配合鄉鎮保甲長，一同組織民眾參加保民大會，縣府期待政工在保民大會上，能妥善推動處理包括役男抽籤順序在內的具體業務，順便辦理其他政府委託的工作。徵兵乃戰時政務的重中之重，各縣無不需要自己的政工隊大力襄助役政。然役政之繁重困難，又非具相當政治經驗與辦事能力之人莫辦。從實際結果來看，青年政工普遍無法勝此重任。

一方面，青年政工對基層政治現實的掌握，及對自我的要求，顯然都不充分。由黃巖縣長對下屬 28 名政工隊員所做的工作理解測驗，反映出他們對工作的看法與作法，及其存在的侷限，頗能說明青年政工的問題。問卷中有一題：

> 鄉長家裡有三個兒子，都是適齡壯丁，但向不列入抽籤，鄉民無一不知，因怕他有財有勢，沒有人敢告發，今派到你到這鄉催兵，一個保長很秘密的告訴你，你將怎樣？

測驗結果顯示：

> （1）調查屬實報告縣府的十六人；
>
> （2）報縣嚴懲的十一人；
>
> （3）可說話，先與鄉長說話，無效，才報縣政府的一人。
>
> 解答：調查屬實，先勸鄉長以身作則，送子出征，不聽，再報請縣府核辦。[30]

測驗中這一題，非常貼合兵役實務。縣長顯然想藉此教育隊員，在目前的現實中，推行兵役固然要力求公平，卻不宜立刻訴諸官府與法令，必須顧慮人情，

[30] 〈黃巖政工隊隊員工作理解測驗結果統計〉，《新力》，卷 5 期 7（1940 年 5 月），頁 16。

先以好言相勸。而且必得訪查核實，以免誤信人言。從測驗結果來看，絕大多數隊員若不是沒有獨立處理這類常見問題的自覺與能力，就是連基本查證核實意識也沒有，只知輕言法辦。最嚴重的問題還在於：政工隊員並不把基層鄉鎮保甲長視爲自己應該配合協助的對象。相反的，保民大會往往強化了青年政工批判匡正鄉村既有勢力的工作傾向。青年政工距離該縣長期待中具有政治智慧、社會經驗與工作手腕的幹部，仍然相差甚遠，很難妥善處理保民大會涉及的複雜基層政治。

例如，諸暨政工隊宣稱：凡是有青年救亡宣傳室的地方，保民大會開得最好。另一方面又透露，保民大會上宣傳的內容太長，令保民失去興趣。此時還發生未經保民大會決議，政工隊員直接推翻保甲長的情形，許多鄉鎮保甲長對政工隊更爲反感。[31]僅僅一頁的報告呈現了許多看似矛盾的訊息，但這些現象其實不過是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政工隊定位的問題。在各鄉鎮中成立青年救亡宣傳室，作爲政工隊的基層據點，本是青年政工側重宣傳的一貫工作路徑。青宣室在號召鄉村知識分子上具有一定的效果，因而較容易召開保民大會。但無論是鄉村知識分子，還是普通農民，雖然被一時熱鬧吸引過來，對口頭宣傳與表演不可能維持長期的熱情。此中暴露出：政工隊只能在自身群體內部進行動員，其實沒有能力接觸底層群眾，也就難以傳達眞正的民隱。既然無法有效動員民眾參加，保民大會縱然召開，也只是單方面的政令宣達。民眾不來開會表達意見，只有上級的壓力勉強能制約鄉鎮保甲長。既無民意後盾，政工糾舉撤換保甲長的要求，成爲繞過保民大會的專斷獨行，這當然難以令後者心服。

對於這些問題，政工隊員也有所反省。湯溪政工隊的范梅林檢討：

> 保民大會初次召集的時候，民眾並不重視，如果單憑本隊同志說教一般的去幹，也不會得到良好的成績，所以本人以為召集保民大會，應由黨政機關共同起來負責，配合本隊行動，才會得到相當的效果。[32]

31　〈諸暨政工隊六月份工作報告〉，《新力》，卷 4 期 2（1939 年 9 月），頁 8。

32　〈湯溪政工隊第五次工作討論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2（1939 年 9 月），頁 11。

范梅林也提醒其他人：不可威逼保甲長，而應該讓他們心平氣和地去辦理各項政務。[33]這說明，政工隊員確實有動輒強迫保甲長的情事。但從政工隊的自我批評中也可以看到，這種行徑體現出政工隊員改變現狀、整頓基層的強烈意圖。因此儘管青年政工與群眾頗有隔閡，法律上亦無權限，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基於先入爲主偏袒群眾的同情心理，「出頭」反對他們本該協助配合的政府基層代理人。[34]這種整頓地方的衝動，反過來使政工隊員尋求縣府當局的背書。所以范梅林將組織保民大會的責任，推回委託政工隊幫忙的縣府與黨部。由之形成一個僵局，政府期待政工隊發動群眾參與保民大會匯聚民意，協助保甲長推行政務；政工隊卻時而以體察民隱的立場，撤換代表政府的鄉鎮保甲長，時而又希望政府命令其基層代理人協助發動群眾，以實現保民大會住民自治的精神。結果，保民大會預想中的民主參與，從未因爲政工隊的協助而成爲便利地方治理與戰時動員的利器，反而成爲困擾政府的根源。無怪有人如此質問：

> 政工隊真是溝通政府與民眾間唯一的機構嗎？真是政治組織中理想的隊伍嗎？稍微一加思索就知道都不會得到一個完全肯定的答案。……新縣制如應切實施行，政工隊正同虛設，如認現在保甲人員不足勝任，儘可以政工隊青年充任保甲長，而不應以更有大使命之青年來重複保甲長之工作。[35]

動員民眾與匡正基層政治，事實上是兩個彼此矛盾的需求。政工隊的介入，不但無法解決此一矛盾，反而引發不必要的摩擦與爭端。一旦處理不當，很容易演變爲縣府與政工隊之間的對立。例如，義烏縣長將政工隊長與數名隊員開除，解送境外強制服兵役。[36]永嘉政工隊被勒令解散後，發表公開聲明斥責縣府。[37]這些事件不過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展現了政工隊對原有政治生態的嚴重衝擊。

---

33 〈湯溪政工隊第五次工作討論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2，頁 12。
34 〈湯溪政工隊第五次工作討論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2，頁 12。
35 建民，〈由政工隊到服務隊〉，《勝利》，號 90（1940 年 8 月），頁 7。
36 卿，〈反對摧殘政工隊〉，《戰鬥》，期 100（1940 年 4 月），頁 2。
37 貞夫，〈對戰時政工隊的一點管見〉，《決勝》，卷 2 期 11（1939 年 5 月），頁 9-10。

當然，在一些案例，確實可見青年政工透過技巧的溝通，說服地方人士配合政令。例如湯溪的馮挺祖，就說動了當地耆宿，讓自己的兒子服兵役，且此後還一直協助該政工工作。[38]餘姚政工隊據稱在中共地下黨員的運作下，成功動員了 140 名志願兵。[39]同樣的，許多地方長官表現出對青年政工的深刻理解，因此也能有效運用政工隊，並使其副作用減到最低。例如新昌縣長林樹藝，就將青年政工的特質，精闢地歸納為：

> 一、能刻苦耐勞。二、能勇敢犧牲。三、廉潔。四、真摯。五、正義感強烈。六、同情心豐富。七、自尊心重，但也有時過於自負不拘小節。八、求知慾強，好奇心重，但接受力強，判斷力弱。九、感情豐富，理智缺乏；多幻想，少毅力。十、火氣太盛，應付才絀；容易興奮，也容易頹喪。十一、對社會認識不深刻，一般常識也不夠豐富。[40]

基於此一認識，林樹藝強調在運用政工隊時，要考慮青年的心氣與限制，不宜用一些瑣碎的事務打發他們，而應該委以重任，使之承擔一項繁難的中心工作。但是在工作以前，必須進行詳密的勤前教育，讓青年政工充分認識該項業務涉及的複雜問題與知識技術。除此之外，長官切勿以威權命令的方式領導青年，而必須以師友的立場，以身作則，逐漸贏得青年政工的信服，才可能成為推動戰時縣政的有力幹部。[41]從林樹藝的敘述可知，青年政工並非不可用，但因為缺乏對社會現實的深切了解，容易抱持空洞的理想主義教條行事，所以必須統馭有術、用之有方，使他們的熱情精力，得到正確知識與觀點的導引，真正投入需要反覆攻堅的行政難關。由此也可以反推，如果不了解青年的特點就貿然任用，很可能未蒙其利先蒙其害，慘遭青年理想主義的反噬。換言之，有必要正確估計青年在政治上的作用。慈谿縣長章駒（1904-1941）便坦率指出，他雖然已能充分運用政工隊，但實不宜對青年的貢獻期望太高：

---

38 〈湯溪政工隊第五次工作討論會紀錄〉，頁 12。

39 蕭崗（本名謝廷齋），〈抗戰初期餘姚黨的建設和群眾工作〉，收入中共貴陽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求索集》（貴陽：編者出版，1995），頁 58。

40 於樹巒等，〈我怎樣領導政工隊〉，《新力》，卷 5 期 1，頁 33。

41 於樹巒等，〈我怎樣領導政工隊〉，《新力》，卷 5 期 1，頁 33。

> 因為他們的工作實在空洞，他們的份子實在易於流動，他們的情感，實在容易消沉和動盪，他們究竟是個年輕人，容易好，也容易壞的。[42]

綜合前述，政工隊存在很多先天的限制。地方官員本身必須具備足夠的見識能力，才能使用此類高度不穩定的人力資源，且使用範圍也有講究。例如，浦江縣長金平歐（1902-1971）只讓政工隊扮演白臉的角色。舉凡徵兵徵糧等激起民怨的事，都不讓政工插手；但發安家費、優待費、冬耕貸款之類的惠民措施，則讓政工隊負責。此外，多讓政工隊做積極的工作而儘量減少消極工作。界定積極消極之目的在於：

> 政工隊的工作，偏重積極，使消極變成積極，積極克服消極。比方說檢舉鄉鎮長兵役舞弊，這是消極的；協助辦理兵役調查及免緩役審查，使弊絕風清，這是積極的。如用全力於積極，消極工作不致需要，或可減少，反是專注於舞弊檢舉，不但阻礙多而其他工作不易推動，而且檢舉亦將不勝檢舉。[43]

金平歐此話實出於對青年作風鞭辟入裡的體會，是得來不易的政治智慧。諸如揭發兵役舞弊之類的戰時政務，固然非常重要，卻必然牽涉到複雜的政治判斷與地方秩序的改變，放任缺乏社會經驗與常識的青年來做，只會招致各方阻礙，使「其他工作不易推動」。權衡之下，還不如讓青年做些有成就感又不挑戰地方現狀的事務工作。只是這樣一來，勢必要限制青年的工作範圍，實質上放棄了以青年重燃基層政權「政治動力」的願望。這樣一種保守的態度，即使在地方官員之間，也未必得到認同。如林樹藝、章駒這樣只有三十出頭的青年縣長，便更傾向全面運用政工隊。但從他們的敘述中也可發現，所謂「全面」，也還是聚焦於具體政務，並且有賴地方官員全力輔導與管理，所耗費的隱性行政成本其實不少。青年政工既需要高明的領導素質，又需要謹慎的使用，顯然不適合一體推行盲目普及，無奈浙江當局的決策卻正是如此。

---

42 於樹巒等，〈我怎樣領導政工隊〉，《新力》，卷 5 期 1，頁 25。

43 於樹巒等，〈我怎樣領導政工隊〉，《新力》，卷 5 期 1，頁 17。

二、青年政治認同與現實的衝突

（一）容納青年政治動力的論述與實踐

成員構成、制度矛盾與運用不當，固然是政工隊整體效能低落的重要因素，但似乎還未到非解散不可的程度。

事實上並不乏爲政工隊辯護的聲音。在支持者看來，政工隊的作爲，不過暴露了早已存在卻無人願意碰觸的政治難題。主編了多本政工刊物的曹天風（1903-1992），就憤憤不平地指出：

> 〔政工隊〕是盡著政治上的啟蒙作用。目前，已轉入「行為宣傳」一階段，口號也，標語也，抗戰八股也，其理論吸引力固漸減，民眾也早已由不知不覺變成後知後覺了，然而在第一時期，誰能否認煽動工作、突擊宣傳工作的必要？去！到民間去，文化人回鄉去，雖舌蔽唇焦而不顧。雖被嗤為賣革命膏藥而不顧，為什麼？為的是使大眾從半催眠狀態中警醒過來。[44]

此一政治啓蒙的論述放在抗戰軍興民族意識初見普及之際，確實有其現實上的合理性。但曹天風也不得不承認，以宣傳「革命膏藥」從事政治啓蒙的階段很快過去，所以他又強調政工隊的另一個重大功能：

> 公務員和特殊階級守法奉公的固不少，但壯丁和一般民眾無端被榨取壓迫，……誰肯仗義執言呢？有之還是不懂世故帶點幼稚病的政工隊員啊！……即使無適當制裁，而敢作大眾的代言人監護人，無權包文拯，政工隊中正不少，為世間留點人氣留點正義感，同時亦為上級政府保留一點威信和法令上的尊嚴，雖說是罪該萬死，志在好名，孺子定不可教！？[45]

44 曹天風，〈浙江政工隊的總評價及其改造〉，《民族》，期 17（1940 年 6 月），頁 2。
45 曹天風，〈浙江政工隊的總評價及其改造〉，《民族》，期 17，頁 3。

曹天風將青年政工形容爲有些傻勁、不計個人毀譽得失的布衣包青天，確實也反映了一部分的事實。富於同情心與正義感的政工隊員，經常揭發地方上各級官員的舞弊行爲，替不少老百姓出氣。另一方面，即使曹天風以巧妙的文學筆法轉化消解「幼稚病」、「志在好名」等指控的負面意味，這樣的辯護也還是從側面證實，儘管政工隊自居爲民眾代言人，但社會上對其「仗義執言」的內容與代表性是頗有爭議的。

對這些批評感受最深的，還是那些親身遭遇各種困難質疑的青年政工。他們其實比任何人都清楚地認識到：政工隊並未達到協助抗戰的預期目標，反而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就如蘭谿政工楊鎮華所述：

> 在言論與行動中，幾乎大家都表示一種相同的苦悶，那就是工作無以開展。……直爽些的人會痛快地說：「這樣弄下去，簡直只能領幾元乾薪了！」[46]

楊鎮華爲此深切反省了青年政工困境的根源，直言青年自身應負的責任：

> 我們的長處，同時也就是我們的缺點。我們的緊張惹起別人的嫉妬，我們的誠懇招來他方的疑忌，他們的天真適足被人利用！因為大家是青年，缺乏人事的訓練；因為大家是青年，沒有周密的思慮。……世故未深，耐性不足，經驗缺乏。為了這緣故，往往固執著理論的一部分，不顧左右，直向前奔。[47]

楊鎮華的觀察十分透徹。他已然看到：青年經驗與性格上的弱點，與其「固執著理論的一部分」之間，存在因果關係；青年的理想性格，並不會使他們敞開心胸接納不同觀點，反倒強化了硬套理論解釋現實的傾向，阻滯了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結果大多數政工隊員沒有隨時間經驗而成熟，依舊是：

> 每只憑理論判斷事情，而不顧及現實的事實。故作兵役宣傳，不能「言必有據」；春耕運動，使農民到城裡來找正在籌備而未成立的合作金

46 楊鎮華，〈政工隊隊員的苦悶〉，《大風》，期 44，頁 3。
47 楊鎮華，〈政工隊隊員的苦悶〉，《大風》，期 44，頁 3。

> 庫。討論戰時經濟，只據理發言，而於政府已在辦了的交易公店、合作金庫、水陸聯營處等事業，卻似毫無所知。[48]

由於政治認識與技能未能與時俱進，青年在遭受挫折之後，政治觀點與行動不是走向務實，反而愈趨激進。楊鎭華爲此提醒青年同儕，一味堅持既往以口頭論理進行的工作方法，不可能有任何進展，因爲「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皆有其支持自身行事生活的框架，非言語理論所能改變：

> 盡我們的力量應付老奸巨滑之徒，只能得到「事倍功半」的結果；以我們的口舌說服專己自肥之輩，簡直是「與虎謀皮」；頑固者有他個人經驗的堡壘，早就堅壁清野，待人來攻，而我們理論的砲彈，很難炸毀他成見的陣地；冷血人的血凝固已多時了，我們心中的火力，一時不易使牠循環起來！[49]

認清這點，楊鎭華最終提出了一套建立在深微政治判斷上的全新認知行動框架，以取代原本理論先行，凡事批判的理想主義行事邏輯：

> 〔我們的工作〕不能拖延敷衍，也不能一舉成功。所以對任何方面，都不願發生摩擦，可也不肯讓步。摩擦浪費國力，讓步即無工作。然而事實上，卻不能免除摩擦，絕無讓步。在民眾組織與兵役補充兩項工作上，同志們不都已有過這種經驗了嗎？[50]

這段話道盡了政治工作之難，卻也道出了政治工作之妙。政治不是邏輯，無法按照論辯規則來消弭矛盾，而是對現實中一系列矛盾的判斷、適應與利用。楊鎭華必然已在實際工作中體會到摩擦讓步中存在的政治可能性，而希望喚起其他有類似經驗政工的領悟。但能夠並願意領會他這番道理的青年政工，恐怕微乎其微。不同於楊鎭華在現狀中尋求出路的呼籲，大部分年輕氣盛、充滿理想的政工，事實上仍然遵循理論的思考路線，對政工隊的定位與爭議問題，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結論。

48 楊鎭華，〈政工隊隊員的苦悶〉，《大風》，期 44，頁 4。
49 楊鎭華，〈政工隊隊員的苦悶〉，《大風》，期 44，頁 4。
50 楊鎭華，〈政工隊隊員的苦悶〉，《大風》，期 44，頁 4。

（二）青年的「新政治運動」

如果說行政官員視政工隊主要爲協助政務的外勤人員，但青年政工未必以此自居。一名政工隊的辯護者認爲：

> 所以政工隊的任務與普通行政人員並不相同，是要站在政治工作的立場去幫助政府。否則為什麼不多增幾個科員、辦事員、雜差，以至警察呢？要什麼政工隊！？[51]

此說有相當的道理，但問題是什麼是「站在政治工作的立場去幫助政府」？這名辯護者繼續解釋：

> 因為抗戰期中的政治與平時不同，需要從「等因奉此」的衙門政府轉到廣大的民眾中去。……它的本身往往直接就是抗戰的工作，與救亡運動不可分離，政工隊站在這兩種工作中間把它聯系〔繫〕起來。[52]

此人所謂的政治工作，顯然不是傳統的文書，而與抗戰有直接關係。但照此定義，拿著政府的公文到鄉村徵兵，算不算是政工隊的「正事」？算不算把「等因奉此」與救亡聯繫起來？按說，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只是這樣一來，該作者又認爲「政工隊因爲脫離了對民眾的宣傳組訓工作卻成爲光桿政工隊了，當然工作內容只有空虛，變成行政警察了。」[53]難道說，同是支援抗戰，協助縣府徵兵只能算行政，只有宣傳組訓才算政治？對此，該作者認爲政工隊應該注意：

> 民眾的情緒怎樣？他們有那些最迫切的問題需要解決？……注意，這裡是說主體是政工隊，政工隊根據各種情況，盡量使自己的工作去配合行政工作，而不是拋棄了政工隊本身不管，完全被動的去「協助」行政工作，假使這樣的話，就一定沒有好結果。[54]

也就是說，政工隊應該更在意民眾情緒與切身問題，行政工作只是配合而已。到此，政治工作與政府主導的抗戰動員之間的歧異，逐步顯示出來。設想一下，

51 林初，〈政工隊工作爲什麼會貧乏化？〉，《浙江潮》，期 91，頁 753。
52 林初，〈政工隊工作爲什麼會貧乏化？〉，《浙江潮》，期 91，頁 753。
53 林初，〈政工隊工作爲什麼會貧乏化？〉，《浙江潮》，期 91，頁 752。
54 林初，〈政工隊工作爲什麼會貧乏化？〉，《浙江潮》，期 91，頁 754。

推動徵兵令民眾痛苦時，政工隊該採取何種行動？如果依上述作者的見解，解決民眾的切身問題才是第一位，此時政府交辦的任務將置於何地？對於這最後一個問題，政工隊的辯護者只是強調做好民眾工作之後，行政工作自然順利。

所謂改善民眾問題，作爲推動工作的手段，絕非政工隊的主要任務。然而，政工隊的支持者，不約而同的將之作爲工作議程的首要項目。這說明在協助抗戰以外，他們另有自己的政治目標與重點期待。以下引文很可能反映了他們對政工隊定位最眞實的想法：

> 我們既認政工隊是抗戰中產生的新政治運動，當然不是現行行政機構的一員，即不是所謂「公務人員」。……我們應認我們是「民眾的代表」，「民眾的導師」。[55]

「新政治運動」一詞畫龍點睛，表明了問題的關鍵。原來青年政工自覺自願的是參與改變現狀的政治運動，而不是維繫既有政治秩序的行政工作。所謂民眾的代表或導師，也就是政治運動領袖的委婉表達。在這樣的認知下，對於受人指揮的行政工作提不起勁，也不願意成爲官僚組織中受到層層節制的低級職員，也是難免的了。這種心態又表現爲對實際工作的鄙夷，

> 現在各縣的政工隊都在做所謂「實際」工作了，兵役，優待，收捐，開保民大會，國民月會，調查戶口。然而他們在做這些實際工作的態度，往往也是不對的。[56]

所謂不對的工作態度，是指沒能堅持領導權，甘居政府機關的輔助之位。此一自我定位與抗戰現實之間的巨大斷層，可以說是政工隊與地方當局一切震盪衝突的根源。

總之，政工隊支持者希望在政府之外領導群眾。無論從法規上還是實務上，這個目標都與現實格格不入。爲了緩和各界的質疑，他們又發展出「新」中間人的論述：

55　未央等，〈政工隊的地位和任務〉，《新力》，卷 4 期 16（1939 年 12 月），頁 8。
56　林初，〈政工隊工作爲什麼會貧乏化？〉，《浙江潮》，期 91，頁 753。

> 政工隊站在那一種地位呢？……「黨部與政府中間」，「政府與人民中間」，「軍隊與民眾中間」，「各種不同職業不同地位的人的中間」，甚至「土豪劣紳與被壓迫欺榨的農民工人中間」，「進步力量與落後勢力的中間」。[57]

比起另起爐灶搞「新政治運動」，這種表述似乎比較溫和，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政府與人民中間」、「軍隊與民眾中間」兩項，的確是根據黃紹竑的指示：

> 政治工作隊他是站在政府與人民之間擔任這種溝通的工作，使政府可以達到要求，人民亦不致因此而發生疑慮與痛苦，使上下精神團結，發揮抗戰偉大的動力。[58]

黃紹竑所說的中間人，本是要求政工隊員深入群眾之中，以耐心柔性的勸說與充滿熱情的示範，化解政府與人民的誤會，引導群眾樂於接受政府的政策法令。[59]新中間人論述看起來是重申黃紹竑的指示，但細加分辨，其實是對黃紹竑用意的擴張與曲解。尤其「進步力量與落後勢力的中間」一語，更是圖窮匕見，將政工隊員的地位轉化爲政府與社會，以及社會階層之上的仲裁者。政工成爲自我賦權的新權威。政策目標擺到一邊，判斷是非善惡與政令是否合理成了優先使命。然而，熱血沸騰、自信純潔無私的青年政工，一般缺乏查核事實與感知人情的歷練，更不具備仲裁者必要的威信與手腕。引發更多矛盾而招致各方不滿的青年，難免陷入苦悶與失落。

擁有指導各方，改變現狀的權力，始終是青年政工理想主義的內核。政工隊的擁護者並不諱言權力問題，曹天風就指出：

> 政治是不能沒有強制性的，有權力才能強制，政工隊卻只有責任而無權力，它唯一的武器是舌和筆，單純靠這武器，來說服群眾，已不易奏效，何況在群眾以上的？故傳達政令時，無法可排除障礙，或糾正

---

57 末央等，〈政工隊的地位和任務〉，《新力》，卷 4 期 16，頁 9。

58 黃紹竑，〈本省戰時政治工作人員訓練團戰時青年訓練團及各縣政治工作隊的使命——黃主席在碧湖對政治訓練團及青年訓練團團員訓詞〉，《浙江潮》，期 2（1938 年 3 月），頁 21-22。

59 黃紹竑，〈今後本省政工隊應有的認識與努力——在全省政工會議閉幕時工作指示〉，《新力》，卷 3 期 26（1939 年 8 月），頁 3。

> 不合理現象，而過度宣傳，也有沒由兌現處，結果多成為預約券，自難完全得民眾信任！[60]

有的甚至公然以中共根據地建立政權的經驗，論證政工隊的價值：

> 誰都知道今天兀立敵後方，牽制了無數敵人，擁有五十餘縣土地的冀察晉邊區，當初建立的時候只憑藉千多人的武力，這就是政治工作的效果。但是他們卻忘記了這種政治工作的力量，正是建立在宣傳組訓民眾的基礎之上的。[61]

將中共根據地的成功建立，簡單歸因於其青年政工的「宣傳組訓」之功，與其說是對中共組織動員模式的經驗總結，還不如說是對青年政治力量的一種普遍迷思。且不說此文作者是否有意「爲匪宣傳」，冀察晉邊區根據地軍事政治操作，今日看來仍撲朔迷離，能將之輕易的歸結爲青年政工的運用，說明作者及其所訴求之讀者腦海中，已然存在一幅「青年創造時代」的政治連環圖，所以即使沒有太多關於中共根據地實際情況的訊息，僅僅透過道聽塗說隻字片語，他們自然而然地從一個想像中的畫面，演繹出其後一連串青年政治開展的「應有」景象。

這些捍衛政工隊的評論，都很清楚點出政工隊面臨困境的結構性因素：它沒有改變現有政治秩序的權力。問題在於，政工隊權力究竟從何處來？是由上級政府授權？還是像中共邊區一樣，從日本人與國府手中搶過來？更重要的是，有了權力，政工隊又想建立何種新秩序？政工隊的辯護者對此並未說明，一心只想著「建立政工隊的群眾基礎，使每個政工隊員成爲民眾熱烈擁護的中心。」[62]簡而言之，還是要透過宣傳使青年成爲政治領袖，以改變現有政治秩序爲目標。政工隊各自爲政的立場與無序脫軌的活動，與必須落實省府政策的縣府之間，因此存在著不易調和的衝突。

---

60 曹天風，〈浙江政工隊的總評價及其改造〉，《民族》，期 17，頁 2。
61 林初，〈政工隊工作爲什麼會貧乏化？〉，《浙江潮》，期 91，頁 752。
62 林初，〈政工隊工作爲什麼會貧乏化？〉，《浙江潮》，期 91，頁 752。

各方的不滿與批評，如潮水般向著工作成績不佳還加大民眾摩擦的政工隊洶湧而至。一手催生政工隊的黃紹竑決意大力整頓。[63]各縣政工隊原先隸屬抗日自衛委員會系統。[64]1938 年 8 月，省政當局將之改由縣政府下設的政工指導室全權指揮，明白確定了縣政工隊員作爲縣府外勤人員的性質地位，完全歸縣長領導運用，[65]並特設省政工室負責督導。[66]凌潛夫指出，這次整改的要點，即在於將政工隊組織納入行政機構之中。[67]整改的目的，就是加強規範隊員，使之依照政府調度而行動，以政策法令爲中心目標並貫徹實行：

> 省方根據於過去八個月各縣實際工作情形，深切感到各縣政工隊與各縣縣政有不可分的關係，為求工作的統一與深入，必須與現有縣政機構密切配合打成一片。[68]

黃紹竑進而要求政工隊，將工作重點由宣傳發動轉移到組訓自衛團隊，將無組織、無法紀、無訓練的散兵游勇，整合爲有國家民族觀念、愛百姓受節制的抗日隊伍。[69]此時，黃紹竑等官員對政工隊工作能力仍有期待。向來鄙視政治機

63 黃紹竑，〈本省政工隊的回顧與前瞻──九月九日對戰時政工隊集訓總隊始業典禮講〉，《浙江潮》，期 27/28（1939 年 9 月），頁 504-505。

64 起初直屬省抗衛會，很快即下放到各縣抗衛會，由縣長兼主任委員指揮監督。

65 〈各縣政工隊改隸縣政府〉，《碧湖》，號 1（1938 年 11 月），頁 5。相關配套措施是確立編制名額（不含義務隊員）、招聘以本地人爲主、提升隊員待遇（有工資）、建立獎懲考核機制（升遷管道：成爲地方政教與社會之後備幹部、升學，以及淘汰方式）。

66 黃紹竑委派其親信秘書吳壽彭與凌潛夫先後主持省政工室。吳、凌二人原本即爲黃紹竑派至省抗衛會負責政工指導工作者。省政工室擁有縣政工隊人事與經費審核權，且將縣長對政工隊的領導列入考成標準，以統一事權。見應占先，〈浙江省戰時政治工作隊的建立和演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63），輯 5，頁 75-81。此次調整組織，乃是省政府正式收編各縣政工隊，打破地域性，以求眞正統合地方力量、有效組訓民眾的重要嘗試。但若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確實就如審查者所指出的，是「黃紹竑與地方及黨部等不同勢力爭奪政工隊領導權的結果。」此外，如果 1938 年 8 月甫到任的民政廳長阮毅成（被視爲 CC 派），眞能如他所宣稱的，親自遴派了當時全省各縣縣長，也可推論是 CC 爭到了全省的縣政工隊。見阮毅成，《八十憶述（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 469。然而，縣長任免的權力，其實主要仍操諸黃紹竑之手。見茹管廷，〈國民黨統治時期浙江省民政廳見聞〉，《浙江文史資料選輯》（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2），輯 21，頁 127。

67 凌潛夫，〈浙江全省政工隊之回顧與前瞻〉，《新力》，卷 2 期 19，頁 15。

68 凌潛夫，〈浙江全省政工隊之回顧與前瞻〉，《新力》，卷 2 期 19，頁 15。

69 黃紹竑，〈本省政工隊的回顧與前瞻──九月九日對戰時政工隊集訓總隊始業典禮講〉，《浙江潮》，期 27/28，頁 505-506。

構的隸屬觀念，自居民眾導師要來監督政府的青年政工，並不因爲編入政府便即掃去舊日的散漫習氣與自我定位。[70]政工隊工作實施綱領列出的項目雖然洋洋灑灑，華而不實，組訓民眾與協助役政才是重中之重。但是政工隊員自身又經常避服兵役，熱鬧有餘的宣傳表演就如同馬耳東風，很難撼動「好男不當兵」的傳統觀念，反而成爲民眾眼中混飯吃的冗雜。

政工隊收編才三、四個月，百廢待興的組訓和役政工作有待開展推進。然而，省府 1939 年度的工作指示中，卻要求隊員轉型成爲戰鬥人員：

> 各工作人員如何於協助組訓團隊工作中，自身獲得戰鬥知能之訓練，由語言文字轉而為實際行動；由一般政工人員進而為戰鬥人員，俾能適應時代要求，領導民眾，參加作戰。[71]

由於屬於戰時單位，政工隊的工作項目包含軍政與民政。實際上，政工隊員一向不從事眞正的武裝任務，只是以政訓間接協助作戰。忽然要求政工隊員成爲戰鬥員，很難說省府眞實的用意爲何。不過，這道指示的字裡行間，對熱愛宣傳光說不練的政工隊員掩不住失望之情，應是無庸置疑。而省政工指導長官凌潛夫，對政工隊的工作績效與作風更是嚴厲批評：

> 浙東這一年來，情形比較安定，一般人便在這苟安的狀態下養成苟安心理，……除去戰鬬以外，沒有其他生路。我們要發動民眾領導民眾，只有自己去領導他們去戰鬬，纔是正當的途徑。此外一切不切要的工作都是浪費個人的生命阻礙民族的發展。[72]

政工隊員一向以發動民眾領導民眾爲己任。但發動的目標應該是奮起抗日，領導的方向也必須是對敵作戰，這是政工隊員的基本任務，也是抗戰的時代要求。從 1937 年底杭州等地失陷後，1938 年整年，日軍並未進攻浙江。然而敵人隨時會渡江入侵，必須上下積極備戰以保鄉衛國。一般民眾並不知道平靜的日子剩不到一年四個月，普遍養成了苟安心理，渾忘身處抗戰之時。就此而論，

70 事實上基本都沒有變。參見未央等，〈政工隊的地位和任務〉，《新力》，卷 4 期 16，頁 8-9。
71 〈省府指示各縣政工隊念〔廿〕八年度工作方針〉，《碧湖》，號 6（1938 年 12 月），頁 9。
72 凌潛夫，〈浙江全省政工隊之回顧與前瞻〉，《新力》，卷 2 期 19（1939），頁 18。

戰時政工隊未能發揮宣傳動員應有之作用，已屬嚴重失職，甚至還熱衷投入其他各種「不切要的工作」，更是有礙於國家民族的抗戰大業。因此，與其任其自行其是橫生枝節，還不如派他們踏踏實實地受訓作戰。

其實，賀揚靈很早即有將政工隊運用於敵佔區而非後方的想法，在「衝過錢塘江，收復杭嘉湖」的口號下，政工隊成爲其「政治進攻」路線的先鋒。此一考量的另一面，則有減少政工隊在國統區內發展活動的作用。他應當已經體察，若不能及時向外「輸出革命」的政工，身受其害的將不是日本侵略者，而是打開潘朵拉盒子的國府。總之，從 1938 年 3 月起，13 名政工隊員率先過江，開展在海北（指錢塘江北，杭州以東，海寧、海鹽一帶）淪陷區的民眾組訓動員工作，到了 6 月 5 日，又有包括 12 名女性在內的 65 名政工隊員，渡江前往海北組訓群眾。這批政工隊員，據稱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以有效的宣傳，普遍發展了各種群眾抗敵組織。然而這次大張旗鼓的戰地工作，到了 7 月 31 日，就被日軍精心策劃的軍事掃蕩粉碎，不但有數十名參加抗敵組織的當地青少年遇害，9 名政工隊員（其中 4 名女性）也爲日軍擊斃或捕殺。[73]

儘管如此，青年顛覆政治的作用，在淪陷區似乎得到了相當程度的運用與發揮。由於不需要顧及「現政權」的穩定，青年政工可以毫無顧忌地滲透到各種團體之中，使之轉變爲反抗（佔領）現狀的青年救亡組織。在敵佔區相對黑白分明的政治環境中，抗戰目標較爲不需要與各方利益妥協，因此青年政工的戰鬥性，也就是破壞既有社會秩序的能力，對國民黨並不會造成太多後遺症。例如，在浙西淪陷區的青年女政工，成功混入通敵的地方報社，一舉將之燒毀。[74] 這並不表示青年政工的所有問題因此都轉成了優點。他們的工作，其實高度依賴其他軍政組織力量的配合。例如，1938 年 10 月 1 日敵軍退出海鹽後，三區政工隊才能重新開展海北的工作。[75]即使如此，號稱吸收培養了大批幹部，打

73 胡雲翼，〈戰鬥二年來的三區政工隊〉，《戰旗》，期 64/65，頁 22；莫仲喬，〈第三區戰地政工隊血鬥紀略〉，《錢江血潮》，輯 2，頁 66-68。

74 胡雲翼，〈戰鬥二年來的三區政工隊〉，《戰旗》，期 64/65，頁 22。

75 胡雲翼，〈戰鬥二年來的三區政工隊〉，《戰旗》，期 64/65，頁 21。

進了當地抗日隊伍中，但從青年政工自己的描述來看，動員基層民眾的可靠辦法仍告闕如，依然長期停頓在宣傳貼標語的層次。徒然增加當地民眾的困擾，無益於增強抗戰力量。[76]從其長官方元民的陳述來看，政工隊組織地方抗日武裝的能力恐怕很有限：

> 我們聽到有些同志的口頭報告，甚至還有對民眾武力抱著懷疑的態度，對游擊隊還有蔑視的觀念。[77]

大部分政工懷著領袖群倫的政治抱負，很難認同地方社會，更遑論運用其潛力。即使在敵佔區，他們還是停留在以「游藝表演」、「化裝宣傳」等手法，浮光掠影的宣講，與在浙東幾無差別，全未意識到敵我鬥爭的嚴峻現實。他們遭受日軍掃蕩時的天真反應，不過反映其一貫的思維與行事風格：

> 遇到漢奸在岸上叫靠船，這時已經身處危境，但是還有同志答說「我們是三區戰地政工隊。」[78]

這種對現實情況的無知無感，與工作上的不能到位，可說互爲表裡。從 1938 年底的一次行動來看，似乎連殘酷的戰火洗禮也難以將之改變。當時三區政工隊組織了青年營與 17 名婦女營隊員，渡江突襲了海寧王店的車站與碉堡。當時宣稱燒毀敵軍倉庫中的 300 桶汽油，並部分破壞了敵司令部，日軍死亡 28 人。[79]但在參與隊員日後的回憶中，這些光榮的戰績隻字未見，只是提到他們沿途寫標語、教鄉村兒童唱愛國歌曲。[80]顯然並未記取數月前的慘痛教訓，仍然是沿襲宣傳的老套，此類行動對於敵人的顛覆效果非常有限。

對於國民黨控制區域的地方行政，政工隊的破壞性卻是立竿見影。以全浙規模最大的餘姚政工隊爲例，在文史資料中，餘姚縣長林澤大都以進步開明人

76　新野，〈來到浙西之後〉，《新力》，卷 2 期 12（1938 年 11 月），頁 9。
77　方元民，〈戰地政工同志之血的教育——第一戰地政工隊被難事件的檢討〉，《錢江血潮》，輯 2（1938 年 11 月），頁 75。
78　方元民，〈戰地政工同志之血的教育——第一戰地政工隊被難事件的檢討〉，《錢江血潮》，輯 2，頁 74。
79　蔣萊，〈活躍在錢塘江兩岸的浙江婦女營〉，《婦女生活》，卷 8 期 3（1939 年 11 月），頁 10。
80　楊長嶽主編，《金蕭地區抗日戰爭史長編（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頁 429-430。

士的面目出現，也樂於配合政工隊領導郭靜唐（1903-1952）的工作，但林澤仍對政工隊頗爲不滿。例如他向隊員訓話時，不留情面的說：

> 各位同志大都從少爺小姐蛻化出來，……一切本身方面的劣根性，腐化性，浪漫性等，……應該在檢討後加以自我批判糾正。[81]

在具體政務上，林澤也有不能與政工隊妥協調和之處。例如：

> 記得一九三九年有一回，逍林鄉岑鄉長與政工隊鬧不團結，郭靜唐一定要我撤換鄉長，這是我多年稔識的老鄉長，我答應暫緩一個月看看情況，郭不滿意，聯絡十幾個動員會委員，由郭領頭聯名給我一封辭職信。我認為這做得太過份了，一氣之下，打電話給賀揚靈請求辭職。[82]

由此可見，政工隊運動式的政治，反過來削弱了縣長的立場與能力。

此處有必要特別討論中共「陰謀破壞」的問題。如本文上引史料所顯示，在有關政工隊的爭議中，似乎確實可見到中共地下黨員活動的痕跡。各種地方文史資料與《浙江革命史料特輯》也都有意強調中共地下黨員對各縣政工隊的滲透。然而由於中共內部人事檔案並未公開（假定確有地下黨的紀錄），僅僅依據口述回憶史料形成的歷史敘述，可信度其實頗成疑問。由於兼有政治坦白材料與統戰宣傳的性質，文史資料往往流於高度類型化的敘事模式，強調黨對救亡宣傳工作的主導作用，以及如何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這些敘述缺乏具體的執行細節，更無法說明青年政工的行動對當地國共鬥爭的實際影響。從文史資料的敘述還可以看出，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前，對於政工隊的政治定性絕非正面，以致相關回憶對中共的角色描述也是含糊其詞。[83]以其中指證最力，號稱

---

81 周立偉，〈三大目的，三大認識，三大希望－林縣長在政工隊集訓時對隊員講詞〉，《戰鬥》，期 18（1938 年 7 月），頁 7。

82 林澤，〈郭靜唐和餘姚戰時政治工作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4），輯 28，頁 94。

83 1957 年 12 月，中共浙江省公安廳編印的敵僞組織參考資料之三〈浙江省戰時政治工作隊〉中，將政工隊判定爲「以『動員民眾抗日』爲幌子，實際是利用一批流浪無業的知識青年宣傳反動政策、法令的一個反動組織。」隨著政治氣氛的轉變，1984 年 5 月，浙江省公安廳發出對「浙江省戰時政治工作隊」覆查結論的通知，正式否定了政工隊具有反動性，「沒有發現進行過有組織的反共活動」。同時認爲政工隊是在國共合作的情況下，由國府「發起組織和掌握領導」的。換言之，仍未明確肯定政工隊中的黨員有所謂「骨幹作用」，遑論受到中共的控制甚至領

地下黨發展最好的餘姚政工隊爲例，核心成員中似乎黨員不少，但中共餘姚縣委具體要他們做什麼，所開展的救亡活動又與打擊國民黨有何關係，則仍有待更多資料說明。從現有記載來看，他們的活動其實與國民黨控制下的政工隊大同小異，都在七、八個月的激情宣傳與群眾動員後，回歸以照顧征屬爲主的一般業務。[84]更從 1941 年以後中共進入浙東建立四明山根據地的情形來看，顯見在浙東各縣原有的組織力量與群眾基礎仍十分薄弱，因而不得不與地方軍事實力派妥協。[85]

由此可見，以青年政治運動的視角來理解，反而更能把握時代氛圍。[86]退一步來說，假設政工隊的所有行動都受中共指使，本文所欲探討之青年政治運

導。直到 1999 年，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纂了《浙江戰時政治工作隊》一書，序言中宣稱中共黨員「實際上領導、掌握了大多數的政工隊」。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浙江戰時政治工作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頁 4-5、439-444。由此可見，中共對於政工隊的整體政治性質與歷史定位確實是「與時俱進」，在不同時期強調不同的歷史事實。因之後來的論述很難說一定比早先的更爲眞實。具體到餘姚政工隊，歷經波折，中共才終於承認，「抗戰初期餘姚縣戰時政治工作隊確實是由我黨掌握和領導的一個抗日救亡組織」（中共餘姚縣委的批覆語）。參見孫孑鳴，〈餘姚政工隊的組織情況與活動情況〉，收入餘姚市檔案局（館）編，《抗戰親歷》（北京：中國文化出版社，2017），頁 103-122；其中頁 120 收錄有：「中共餘姚縣委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關於爲抗戰初期餘姚縣戰時政治工作隊明確性質的批覆〉」。可見直到 1985 年中共才對餘姚政工隊的政治性質有了明確結論。參考黃紹竑在 1960 年的回憶，他雖然強調自己的開明，卻也不敢宣稱政工隊當時已受中共控制。見黃紹竑，〈我與蔣介石和桂系的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60），輯 7，頁 105。

84 上引孫孑鳴的回憶，其實是他 1959 年手寫的坦白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孫不是中共黨員，但身爲政工隊的幹事長，他對隊內共產黨員的活動有相當掌握，其見聞可與中共黨員的回憶相比較，如陸學斌、蕭剛、唐偉、陳子方、薛誠，〈抗戰初期的餘姚政工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浙江革命史料特輯（六）》（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1），輯 20，頁 92-93、110-112。兩相對照，似乎可以說國共兩黨在餘姚的關係大體還是合作多於衝突。以文史資料中號稱十分「落後」的鎮海政工隊爲例，其活動事實上與所謂中共控制的政工隊並無明顯分別，甚至連反封建一類激進話語的使用也如出一轍。見蔡竹屏，〈寧屬各縣政工隊概況〉，收入《浙江文史資料選輯》（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63），輯 5，頁 84。隊本部，〈一年來的鎮海政工隊〉，收入鎮海縣戰時政治工作隊編印，《鎮海縣戰時政治工作隊成立周年紀念特刊》（1939），頁 11-15。

85 見吳敏超，〈浙東抗日根據地的統戰工作再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8 年第 9 期，頁 21-33。

86 從餘姚政工隊主要組建者郭靜唐對林澤詢問的回答，以及他死前對友人的傾訴看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的他還不是共產黨員。如果自己領導組織的政工隊是共黨組織，郭靜唐於 1950 年代初正遭受審查，爲何不交待這麼有利的材料？另有材料指出，郭是 1944 年申請入黨，1946 年

動問題依然成立。蓋中共黨員所以能滲透與操作，主要利用了青年政工既有的論述、組織與行事作風。或者說，中共可以利用青年的原因，除了青年群體本已浸潤在 1930 年代民族主義與左傾的大潮流中，還在於國民黨難以從論述與實踐層面否決青年衝撞政治現狀的正當性。此所以政工隊不但沒有成爲政府施政的助力與後盾，反而成爲阻礙地方行政，滋生敵對顛覆勢力的溫床。

或有人質疑，政工隊的行動即使不全然受共產黨操作，也極可能是國民黨內派系鬥爭的結果。例如，政工隊的訴求，源自新興三青團對浙江黨、政兩方權力的爭奪，而非單純青年政治運動的結果。對此，已有學者對浙江三青團做出詳實研究。三青團作爲新興勢力，確實透過介入基層政治積極擴張自身的權力，從而與黨、政、紳三方都爆發衝突。但在此過程中，三青團除了與黨部勢同水火，仍和政與紳互相合作，例如，黃紹竑就極力拉攏其勢力以牽制 CC 系，地方官員也藉之與地方勢力抗衡。縣長林澤就是浙江三青團的重要幹部，而他對政工隊的不滿，很難解釋爲受三青團的影響。[87]也就是說，三青團等地方派系的政治盤算，並不必然導致政工隊顛覆政治現狀。派系鬥爭的縱橫捭闔因

才成爲黨員，可見在政工隊時他確實不是共產黨，他所領導的政工隊也就不容易得到中共的承認。參看姜枝先，〈郭靜唐生平事略〉，《浙江文史資料選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輯 41，頁 224-225。另外，林澤的回憶也是由供詞轉成。林澤先前是三青團員與國民黨縣長，儘可能地將餘姚政工隊與中共掛鈎，以證明自己的「進步性」，合乎他的較佳生存策略。但即使如此，林澤在政治審訊中，也不敢說郭靜唐就是共產黨，蓋於此類重大政治定性問題上信口開河，很可能弄巧成拙波及自己，搞成反黨反革命。所以，林澤還是委婉地表示了他不時與郭靜唐意見相左—亦即對政工隊妨礙地方政務有所不滿—不過是呼應了他早向郭靜唐確認過的一個事實：政工隊所做所爲很難說是出於中共的指授。見上註。

87 楊煥鵬，〈三青團參與政治及其與浙江各地方政治勢力關係〉，《史學月刊》，2004 年第 3 期，頁 67；楊煥鵬，〈論三青團對浙江地方基層政治的影響〉，《抗日戰爭研究》，2010 年第 3 期，頁 28-40。另一個派系鬥爭說難以成立的證據是：政工隊從成立訓練始，其重要幹部任命就已考量派系平衡，其中既有三青團成員，如黃紹竑的親信吳壽彭，也有如 CC 的許紹棣。另外賀揚靈的親信劉廣惠，與縣長林樹藝、章駒、金平歐都出身中央政校，理論上都屬 CC 系，但他們不但並未打壓政工隊，許多人還主持了政工隊的組訓。以此來看，國民黨的派系在上層中或許還壁壘分明，但越到地方，就越難與具體的人際關係區隔，如林澤這樣八面玲瓏的縣長並不少見，與各派維持良好關係才是他生存與工作的前提。另外還可以參考本文註 4 的說明，亦顯示三青團自有爭取青年的系統與路徑，並不以爭奪政工隊爲其目標。總之，在缺乏更多史料的情形下，似不宜漠視政工刊物等原始材料反映的明顯現象，反而根據刻板的上層派系分野與莫測高深的鬥爭傳言猜測基層青年政工的動機。

地、因時、因人而不同，難以從政工隊言行看出一貫的派系立場。但由從屬於各派系的政工刊物來看，政工隊衝擋地方政治既有勢力是一普遍現象，更多體現青年政治運動內在的邏輯。

總之，中共與國民黨派系鬥爭因素難以否認以下事實：大體而言，國民黨當局並不能發展出一整套可行論述與作法，駁斥青年政治想像的虛妄。國民黨所以「有苦難言」，實有深刻的歷史原因。

三、青年政治與政工生活

（一）青年政治的自由主義治理性淵源

1938 年 9 月，爲了改善政工隊暴露出的各種問題，省政府在將政工隊直隸縣政府的同時，又舉辦了全省政工隊集訓，以求統一各地政工的思想與行動。首次集訓有來自全省 59 縣政工單位的 329 人參加。擔任訓導工作的總幹事吳壽彭（1906-1987），對青年政工的作風情態留下了詳實深入的記載與批評，提供瞭解浙江青年政工群體的有效樣本。透過他的敘述，可以更加認識青年政工政治想像的底蘊與淵源。

吳壽彭察覺，除了嬌生慣養與態度散漫，如晚上講話不睡覺、上課剝花生摳腳、挑剔伙食等，受訓政工日常言行反映出相當一致的個人主義與反權威傾向。例如，尊敬國旗長官等典禮儀節，受訓青年感到「好像怪不自然似的」。[88] 更有甚者：

> 有一位同學在升旗時一再吐痰。當我糾正他後，他在日記中寫著吐痰確實不好，但在不得已時不得不吐了，又說：「誰願意當漢奸，但當生活無門，也就不得不……了。」[89]

這名受訓政工舉止背後的身心原因不得而知，但他從個體需要的角度，將吐痰與叛國相提並論，是典型的個人主義政治認識論，也就是以高度個人化的經驗

88　吳壽彭，〈政工隊集訓之開始與結束〉，《新力》，卷 2 期 7，頁 10-12。
89　吳壽彭，〈政工隊集訓之開始與結束〉，《新力》，卷 2 期 7，頁 13。

與抉擇，作爲合乎「人性」的「眞實」表現，進而以之評價政治行止與相關責任。由此，大部分規訓集體的舉措，就被視爲壓制「個性」、不符合「人性」的虛文教條，而成爲應該反抗的對象。相應的，學員高談民主，卻沒有「互相約束的能力和興趣」。有人在討論會上不守秩序，遇其他學員勸阻，立刻反嗆：「你憑什麼資格來管我？」[90]這些青年對個人自由斤斤計較之餘，卻對涉及抗戰的實質問題大而化之：

> 這次要各人做的文章，是一個極實際的題目，不料……在實際問題上著手的僅十之二三。好些大講飛機大砲與游擊等，而自己拿的步槍不知道口徑射程。[91]

這些空言高論、不重現實的思維作風，與鄙視規訓權威的心態，並非集訓營區的特例，實是當時政工青年在平日政治生活中普遍養成的積習。[92]此類習氣固然繼承傳統底層文人好發清議疏於致用之遺風。當時社會抗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此種理直氣壯伸張個人權利的言論竟也出現，則上述青年政治形跡之憑藉，顯然於傳統文化以外，尚有能超越民族大義的某種思想資源。下文將要說明，此類青年政治運動現象之所以可能，或許有中國以外的世界史因素。

王汎森在〈「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一文中，間接分析了青年政治運動的現象。該文旨在探究私人領域如何爲「主義」入侵而日趨政治化，但討論的背景與前提，卻正是一個舊秩序瓦解後，無數青年個體從過去「大經大法」中解放出來的歷史情境。個體正是在此一特殊歷史情境中，意識到自己是「青年」，從而有屬於「青年」的欲望、追求，以及在科學至上、懷疑價值的實證主義框架下，難以解釋人生困惑的虛無與苦悶。換言之，在進入所謂主義時代之際與之後，許多個體並非是在眞空中自動地擁抱主義，而是已然在「大經大法」與主義時代之間的某個隱蔽的框

90 吳壽彭，〈政工隊集訓之開始與結束〉，《新力》，卷 2 期 7，頁 12-13。
91 吳壽彭，〈政工隊集訓之開始與結束〉，《新力》，卷 2 期 7，頁 13。
92 〈武義政工隊第三十八次工作檢討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2（1939 年 9 月），頁 9。余麟，〈政工隊應有的三點基本認識〉，《號角》，期 41，頁 7。

架中，形成了自我以及與此相應的價值需求。[93]王汎森沒有爲這個主義時代前的「主義」命名，而以新文化統稱之。但他所列舉的個體、青年、自我、愛情、解放、虛無，科學、乃至實證主義等觀念元素，卻與傅柯（Michel Foucault）批判現代性文化霸權的分析互相印證。傅柯使用「自由主義」來命名上述諸觀念的源頭。此處及其建構的認知系譜，借用傅柯的視角進一步解析青年政治運動，不難發現，青年政治運動之產生與自由主義治理性（liberal governmentality）有深微的關係。所謂自由主義治理性，主要是一套知識權力架構（knowledge-power configuration），也就是透過生產詮釋知識來產生行使權力。[94]現代治理性之要義，即在形塑一種自由主義形態自我（the liberal self）或主體性，使以個人自由爲核心的知識權力論述，成爲大眾理解與實現自我的主要框架，因而以符合現代性體制所需的「知識」與「眞理」進行自我規訓，從而鞏固現代性體制對人類嚴密的控制。在這套自由主義治理性中，青年正是自由主義形態自我的主要載體。自十八世紀以來，現代眞理體制即透過（科學）知識生產，建構出青年自我對「自由」「眞理」的「先驗」悟性，以及此一「稟賦」爲傳統權威打壓的主流觀點。簡言之，青年被想像成天然地不受成見拘束，具備自由意志與洞察力，因此，他們比其他社會群體更能發現眞相，從而將自我與其他人從無謂的威權壓迫中解放出來。這種基於想像中先天智識優勢的解放政治論述，由是成爲青年在政治上的主要訴求與存在理由。[95]在這樣的背景下，青年政治運動登上了世界史的舞臺。

93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思想史1》（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 85-137。感謝審閱者提示。有趣的是，文中選擇以一左一右兩個「新主義」──主要是共產主義（左）與三民主義（右）的興起開啓「私人領域的政治化」，其理論預設正是基於當時橫掃一世的主流思潮──隨歐風美雨長驅直入、源遠流長的英美「自由主義」（中），儘管不必總是綴有「主義」二字。「自由主義」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瀰散開來，眞正的開啓了近代中國在各種領域（不僅是文藝的、思想的、政治的。名目達二千多種之多）的各種主義瘋狂生長的「主義時代」，爲新主義席捲近代中國奠定基礎。此種自由主義與胡適等人標榜的有所不同，此姑不論。

94　Mike Gane, "Foucault on Governmentality and Liberal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5:7-8 (2008), p. 354.　傅柯所謂的「自由主義」主要指憑恃操作特定自由觀的統治術，往往與各種非自由，甚至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兼容，而未必符合古典自由主義者的主觀認知。

95　David F. Gruber, "Foucault's Critique of the Liberal Individual,"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6:11 (Nov., 1989), pp. 615-617; Anna Margaret Anderson, "The Constitution of Youth: Toward a

受篇幅限制，本文不擬討論自由主義治理性在中國展開的起點與範圍，也無意宣稱此一現代性框架是引發青年政治運動的唯一原因。如同王奇生的精彩研究所顯示，新文化與新青年的聲勢乃是史家的「後見之盲」：相關論述最初只是「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的主張，經歷一番「運動」的過程後，才逐步成爲知識群體的共識，當時人未必能意識其歷史重要性。受此啓發，本研究關注的正是那些已然被大多數人視爲「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的現代青年想像。[96]至於自由主義治理性是否爲歷史當事人主觀認定的主流論述，並不影響其意義。既然大部分政工隊員是五四前後出生成長的智識青年，若謂其智識養成立受到以科學爲主的新式教育與知識體系影響，應屬合理。正如蔣夢麟以少年時就讀浙江省立高等學堂的見聞爲例所指出：

> 新興的知識分子對一向控制中國的舊士大夫階級的反抗，不但是知識上的反抗，而且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反抗。自從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以及其他科學觀念輸入中國以後，年輕一代的思想已經起了急劇的變化。十八世紀的個人自由觀念與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同時並臨：個人自由表現於對舊制度的反抗。[97]

蔣夢麟顯然不可能看過傅柯的理論，但他的分析與傅柯意外地吻合，而這並非偶然。他們只是清楚分辨了青年自由主義形態自我的兩個基本元素：即「十八世紀的個人自由觀念」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科學發展觀，並且道破此二者與反權威反體制的青年政治、社會、以至文化傾向的深刻聯繫。本文據此以自由主義治理性流布於中國爲事實，並非隨意以歷史附會外來理論。藉由分析浙江省青年政工的言行，下文將進一步指出青年政治運動背後諸般自由主義治理性預設存在的確切證據與巨大影響。

Genealogy of the Discourse and Government of Youth,” (Ph. D. Dissertation, RMIT University2010), pp. 2-5, 68-71, 81;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p. 205-210.

96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爲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21-40。

97 蔣夢麟，《西潮》（臺北：中華日報出版社，1959），頁34-35。

青年政治運動以反權威爲實現自我之門徑，反對由上而下的科層管理是應有之義。而標舉個體自發的政治參與，民主原則因此被普遍用於各縣政工隊的組織運行之中。曾爲政工隊長的高宗龍，在討論政工隊缺點及其改進之道時，便宣稱其參與的政工隊是青年自由結社而成立，所以：

> 政工隊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權」，……民主精神是需要培養的。……政工隊是在自我訓練，互相訓練中成長的，貴有創造的思想和自動的態度，……所以政工隊員，平日對於研討實際政治的問題，須有活潑的思想，不受任何方面的束縛，惟一經決議或結論之後，大家須一致服從，這樣，真理方能獲得，工作方有進步。[98]

由此，高宗龍呼籲當局退出各類青年政工的討論會、學術研究會，讓青年在民主的教育中，自然淘汰「腐惡分子」，因爲他相信「青年的理智，雖稍覺幼稺，而其對於社會的觀察，頗多饒有眞理之處」。[99]高宗龍假設徹底的結社與言論自由即能得出眞理共識，將政治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委諸某種想像中先於政治存在的志願結合，表現出鮮明的自由主義思維特徵。[100]然而此一假設所以成立，不僅是因爲自由主義理論中自由爲自然權利，先於政治權威，故正當政治秩序之生成，只能出於前政治狀態中的自由人授權。[101]更重要的是，此一假設得到整套自由主義治理性人類科學（human science）的背書，使得無法考證且與歷史經驗多有扞格的社會契約與自由人前提，不僅看來不似空想，還像是對「自然狀態」的眞實陳述。[102]此所以儘管政工隊乃奉命組建，洵非自由結社，高宗龍卻能將之作爲立論的出發點，甚至理所當然的認爲理智「稍覺幼稚」的青年足以產生「饒有眞理」的政治判斷。令人納悶的是，他承認先前有人「假藉民主精神，從事把持搗亂」，可見民主集權制並未導致服從多數意志的結果，

98 高宗龍，〈如何改進縣政工隊？〉，《勝利》，號 29（1939 年 5 月），頁 9。
99 高宗龍，〈如何改進縣政工隊？〉，《勝利》，號 29，頁 10。
100 錢永祥，《縱欲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裡的政治倫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 184。
101 普特（André Van de Putte），劉宗坤譯，〈共和主義自由觀對自由主義自由觀〉，《二十一世紀》，總第 54 期（1999 年 8 月），頁 28-31。
102 David F. Gruber, "Foucault's Critique of the Liberal Individual,"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6:11, p. 618.

卻又要求更加放任自由的組織討論方式，恐難自圓其說。[103]高宗龍能夠大言不慚說出這些幼稚的政治見解，足見自由主義治理性入人之深，已到了「不證自明」的程度。

（二）來自學習理論的政治正當性

從高宗龍一味鼓吹自由討論，表明自由主義治理性不僅在論述上發揮影響，更催生追求相應的政治實踐與生活方式的強烈衝動。除了高唱自由討論，青年對自我訓練或學習的反覆強調，則爲受自由主義治理性驅使的另一顯著徵象。如玉環縣政工隊長侯企之在受訓日記中所寫：

> 過去我在社會上工作，憑著在學校時學得的一些東西，真感到不夠應付，平日要想參加一個訓練機會而不可得，現在既有此良好環境，良好師朋，再不切實運用它，把握它，還待何日！？還待何時！？我要訓練：我要進步！我要向上！[104]

從學校畢業後，八、九年來，侯企之一直在地方上任教與辦劇團，從事著青年式的政治工作。從日記中自承所學不足以應付，以及「我要訓練」、「我要進步」、「我要向上」等吶喊，不難察覺到一股鬱積已久的失意與衝動。顯然戰前比較安定的環境，並沒有給他太多發揮的空間。多年過去，還是人微言輕。政工隊訓練對這位日益資深的「進步青年」而言，似乎帶來了青春再起與人生翻轉的難得機遇，無怪他如此亢奮地寫道：「是的，這是我學校生活的重奏，他把我的年齡減輕了！他使我的靈魂更充實⋯⋯。」[105]表面上，這不過是當時下層知識青年改變個人境遇的需求與策略，與科考時代求取功名的士子並無本質上的分別，都是要增加自身的文化資本。但也必須指出，隨著傳統聖賢之言爲現代教育與知識形態所取代，青年所理解的學習，已不僅是取得權力的中性

103 高宗龍，〈如何改進縣政工隊？〉，《勝利》，號 29，頁 9。
104 侯企之，〈我的受訓生活〉，《浙江政治》，期 8（1940 年 11 月），頁 69。
105 侯企之，〈我的受訓生活〉，《浙江政治》，期 8，頁 69。

工具，更是對政治內涵的激進重新定義，可以說帶有深刻的自由主義治理性印記。以江山政工隊員余麟的說法為例：

> 政工隊不但是戰時青年工作的機構，而且是戰時青年的教育集團，所以每月三分之一的時間，省令規定是要厲行進修的。……總理的淵博學問是在革命過程中不斷學習得來的，歐美的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每天都是坐在圖書室研究室化驗室裡不斷的研究著。[106]

首先，浙江省政府規定政工隊員三分之一的時間用在學習上，似乎意味著政工隊的性質越來越接近流亡青年的培訓收容機構。救濟失學青年，省府自有一套教育文化政策。除了初時某些縣分，無論前方還是後方，政工隊皆以招聘本地青年為原則。那麼省府此時又提倡學習，也許有著以增加學習時間提升政工政治能力的用意。不過純就論述本身來看，此一加強學習的設想是基於政治是可以學習的「科學」知識。政工隊員將政治領袖（總理孫中山）與教授、科學家、發明家相提並論，顯然省府與青年政工在相當程度上共享了政治等同科學的自由主義治理性預設：如前所述，現代眞理體制宣稱青年具有洞見眞理的先驗智識。此說有類科學先證成某種不依賴社會文化積累的主體性及認識能力，如此一來，青年始可憑藉主體「內建」的「理性」，以科學方法簡化現實，從而在相對缺乏閱歷的情形下，依然能洞悉紛繁世態後之眞理。也只有將政治等同科學的眞理體制內，經驗有限的年輕人，才可能以學習數理科學的靈敏，抗衡長輩在長期政治實踐中積累的政治智慧，甚至取得話語與行動的優勢。余麟的勸學言論，內在實具有借重眞理體制中（庸俗的）科學主義觀提升青年政治社會地位的意涵。由此導致青年普遍相信「只有正確的認識，才有正確的方法」，進而耗費大量時間閱讀討論「原則上的書」，以增進自身的「學術」。然而究其實際，所謂「原則上的書」多為理論，旨在供應縱論古今中外大勢時所需要

---

[106] 余麟，〈政工隊應有的三點基本認識〉，《號角》，期 41，頁 6。

的論據。照政工青年自己的話來說，學習的實用性更多表現爲政治生活中合宜的「姿態」。[107]

總之，在實踐中，學習難免會與「學而優則仕」的文化理解糾纏在一起，但下文將表明，在青年政治中，學習本身已是一種政治上不可或缺的「規定動作」，其功能在將政治能力等同學習「科學知識」（主要指抽象理論）的能力。於是「政治」與「學習」遂混爲一談，從而確立青年的政治地位。

學習是政治實踐的事實，也決定了學習的內容與方式，必須符合青年政治的需要。伴隨青年在眞理體制中取得了與政治實務經驗分庭抗禮的知識／權力，在政治實踐中，他們往往對思辨層次上純粹抽象精微的理論充滿熱情與敬意，認定那是經驗世界賴以運行的法則，乃至忽視實務細節。如同方元民所說：

> 〔青年政工〕缺少效法的精神，缺少沉著地了解事物的實際精神。……因為太熱情衝動，對比較深刻的事物不了解，而且也不願意去了解。[108]

「對比較深刻的事物不了解，而且也不願意去了解」，方元民這句話，呼應了楊鎮華所指出「固執著理論的一部分」，無意之中點出了理想主義熱情背後的黠巧。蓋這些青年表面上看起來一派天眞，然而他們多少出於本能地意識到，在能力經驗資源佔有優勢的其他群體，尤其是現任官員面前，避免實質問題的討論與解決，始終堅持理想主義「不拘小節」、「不隨流俗」的高調姿態，有利於維護自身在青年政治語境中不容挑戰的特權。此所以方元民後面談到了制裁。[109]他或許已經隱隱認識到，如果不能裁抑青年政治特權，則很難讓青年致力於在地緣政治的殘酷現實中求取國家民族與自身的進步。

再來看學習如何成爲青年自我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這種生活追求，爲前述青年的政治實踐抹上一層理想主義的光暈，美化了其中的功利色彩。許多青年也確實以實現自由主義形態自我現實爲職志，他們對自我發展的盤算，也帶

---

107 幼鷗，〈政工療養室：我們是在怎樣學習著？自我教育一月概況〉，《政工生活》，期 36/37（1939 年 10 月），頁 15-18。

108 方元民，〈第三區戰時政工隊的發展過程〉，《錢江血潮》，輯 2，頁 60。

109 方元民，〈第三區戰時政工隊的發展過程〉，《錢江血潮》，輯 2，頁 60。

有浪漫想像的成分。或者說，縱使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學習也是一種維持自我實現可能性的生活風格。在此情境下，所謂學習或提升的內涵，就更加遠離具體知識與工作能力的精進，往往僅是個人智性成長的感覺。結果政工隊成了烽火中的桃花源，爲涵養青年自我提供了「優越的環境」，從而催生出珍惜「政工生活」的意識：

> 我們自私的一點來說，政工隊的組織是在適合戰時的需要，戰爭結束之後，絲毫不容懷疑政工隊的機構是不適合那時的需要而撤銷的，所以我們處在這個優越的環境裡是應該努力充實自己，我們難道願意天天在掘自己的墳墓嗎？同志們，要是我們愛惜自己的生命，就應愛惜今日的政工生活。要愛惜政工生活，我們即需要不斷的學習學習，學習，再學習，不斷的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啊！[110]

在以「學習」與「教育」延續自我理想的「自私」願望驅使下，政工生活成了現有軍政建制與例行業務的對立面。從一些政工隊員的回憶中可見，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學習和宣傳。隊員們認眞學習進步理論，讀文藝書刊，唱抗日歌曲」。[111]這些「進步」活動雖少軍政實效，但有助於強化青年的自由主義形態自我。

弔詭的是，青年越是在深沉層次的自我理想上受自由主義治理性規訓，在表淺意識中就益發因襲眞理體制「獨立思考」的反權威邏輯，其結果是言行的趨同，一致表現出「桀驁不馴」的強烈群體性格。加之當局無法充分提供彰顯自我的任務，還一味要求他們循規蹈矩，遂使不少政工隊員爆發更強烈的叛逆心理。例如三區政工隊下的少年營，因爲不滿賀揚靈要把他們納入正規編制，趁著暴雨黑夜潛入行署，在賀的辦公室門上張貼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12]這類行徑，在以口述回憶等文史資料爲基礎的中共革命史與黨史敘述中，幾乎

---

110 阿楚，〈政工隊和政工隊員的面面觀〉，《龍游民眾月刊》，期 7，第 9 版。

111 張遵文、洪建平，〈活躍在天目山區的抗日救亡團體——浙西行署少年營〉，《杭州文史資料．湖上拾遺》（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輯 27，頁 228。

112 張遵文、洪建平，〈活躍在天目山區的抗日救亡團體——浙西行署少年營〉，《杭州文史資料．湖上拾遺》，輯 27，頁 231。

一概成爲中共黨員精心策畫的對敵鬥爭策略，用以佐證革命力量之浩大與無孔不入。然而，參照當時政工的普遍情態即可發現，正是在政工生活超越軍政現實追求自我實現的氛圍中，「年少輕狂」與政治顛覆之間的界線變得越發模糊，以至於留下可供中共發展的空隙。可以說，青年生命敘事與生活實踐掩蓋了政治鬥爭的冷酷性，甚至使之浪漫化。這種「青春無悔」的追求，往往訴諸缺乏明確政治意圖的形式，不經意地解構了政治的優先性與嚴肅性，若說是出自中共地下黨的刻意營謀，恐怕未必盡然。如麗水政工隊的營火晚會，當時眾人討論如何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講到熱烈處：

> 像缺了堤壩的洪水，每個人叨叨絮絮地說出了自己對於問題的見解。火光熊熊地照耀得每個青年人的臉發亮。當討論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時候，有人立刻提議：「把火炬堆集在中央」！大家興奮地喊；拳頭一齊舉起來了。[113]

接下來人人呼口號，喊著要宣傳、殺漢奸，但沒有得出明確做法的結論。這段抒情的描述，或許並不精確。但像這樣洋溢著青春熱血，以至完全忘記國難時期應有的政治分寸，毫無疑問是政工生活情調忘形的流露。

（三）口頭論辯與權力運作

浪漫的晚會正是自由討論的變體，而討論又是政工生活與學習的最主要內容。另一份餘姚縣以下區政工隊的自我教育計畫，進一步說明了自由主義治理性對政工生活的影響。根據此計畫，除了每晚舉行工作討論會，每週還要舉行自我教育報告會、問題討論或講演會各一次。這些會的名稱內容大同小異，都有透過集體分享交流增加隊員學識的功能。除此之外，計畫還規定每天讀書一小時，將進度逐日列入工作旬報表。舉行自我教育報告會時，隊員還要提出完整的讀書心得報告。[114]如果這份自我教育計畫得到貫徹，政工隊員每天用於實際工作的時間將大爲減少。計畫並未說明自我教育與工作能力之間的關係。但

113 郁方，〈晚會——麗水政工隊的工作，學習與生活〉，《新力》，卷 3 期 14（1939 年 6 月），頁 12。
114 〈政工第四區隊自我教育計劃〉，《政工生活》，期 13（1939），頁 13-14。

這樣一份跟學生讀書計畫相差無幾的文件可以刊登，已說明其作者與主其事者都假定：隊員知識上的長進將改善政治工作。也就是說，政治本質上是可以口頭傳授與閱讀的知識；論理說服成了政治工作的主體。如此不免促進了青年在書本、口語上學習的動機，藉由知識的累積，使自己在無數討論發表的場合中，得到同儕的尊重與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政治也就無可避免更加抽象化知識化。

知識權力架構下的政治，自然重視學歷文憑，就如省府企圖改善工作績效，要求：

> 凡智識能力過低（教育程度至少須有初中畢業），生活腐化，工作不力，完全職業性者，應嚴予甄別，盡量淘汰；如全隊多數隊員皆如此，應先予解散。[115]

這份指示欲藉提高教育門檻等等，剔除那些「職業革命家」。蓋當局以為，學歷越差的青年，越可能就食於政工隊，也越可能對自身處境不滿，而趨向激化。反之，學歷較高者，理應見識較高，比較講道理，工作上自然比較就事論事。這份代表官方立場的指示，正反映當局深受青年的影響，對政工生活與學習詮釋，同樣不自覺受自由主義治理性支配。政工隊績效不佳的主要問題，其實不在於隊員的文化程度或學歷。直屬政工隊在巡視各縣政工隊時，已發現工作表現與文化水平並不成正比，例如：

> 麗水是近來文化人集中的地方，抗戰空氣，民眾情緒，與救亡工作之熱誠，應該特別高漲，但各種工作，還大抵限於城區及公務員。[116]

聯繫到前述那種暢意發想的營火晚會，甚至可以說，由於認知實踐框架的限制，文化程度越高，越可能天馬行空，從事實踐工作的意願與能力反而更低。

圍繞自由、平等、民主參與與討論組織的政工生活，本來就有利於擁有較高文化資本的青年。就以某次紹興政工小組討論會的過程為例，可以看出形式上民主平等的政工生活，其實擴大了少數人原本在智識權力架構中的優勢，加

115 〈浙江省各縣政工隊之改進〉，《新力》，卷 3 期 5（1939 年 4 月），頁 11。
116 直屬政治工作隊，〈訪問處屬五縣政工隊報告〉，《新力》，期 15，頁 12。

深了青年內部本已存在的實質不平等。小組討論最初的主題是自我教育，幾名政工發表了在工作中學習的一般論點以後，政工章嘉泰表示：

> 關於自我教育，我以為工作實踐學，必須把握住理論，把握住中心，如事前不能抓住理論，工作容易發生莽撞與失敗。[117]

這段話明顯有質疑先前發言同志理論素養的意思。此話一出，立刻引來了對方的駁斥，一名女青年說：

> 整天看報看書，從書上得來的理論，不切實際，故自我教育應從工作過程中去學習。[118]

另一位政工隨即發言：

> 接近上層社會知識分子，如自我教育不著重，必為人輕視。[119]

此人言詞看似不具針對性，但隱隱帶有支持「理論派」的意思。爲接近文化資本更雄厚的上層社會知識分子，自我教育當然不能不加強抽象文化符號的掌握。也許是不願面對自己在大知識分子前的渺小，亦或只是慣性的附和多數，許多人紛紛發言贊成實務重於理論的觀點。

迎戰這些一哄而起的實務派「群眾」觀點，理論派政工張正方指出：

> 因為一個人要是不能懂得理論，受了他人的指揮，就不能找到合理的答復；所以書本上的知識是非常需要。[120]

這話引出了實務派有系統的反駁：

> 徐士杰：我對張同志的意見是有補充及批評，我認為從工作中得來的經驗，纔是真的自我教育，假如平日看了書籍與報章，是鄉間工作一定不能運用，甚至於遭失敗，因為向老百姓去接近，並非一種辯論會可比。[121]

---

117 〈如何厲行自我教育——紹政工集訓隊小組討論會紀錄〉，《越王魂》，期 5/6（1939 年 2 月），頁 14。

118 〈如何厲行自我教育——紹政工集訓隊小組討論會紀錄〉，《越王魂》，期 5/6，頁 14。

119 〈如何厲行自我教育——紹政工集訓隊小組討論會紀錄〉，《越王魂》，期 5/6，頁 14。

120 〈如何厲行自我教育——紹政工集訓隊小組討論會紀錄〉，《越王魂》，期 5/6，頁 15。

121 〈如何厲行自我教育——紹政工集訓隊小組討論會紀錄〉，《越王魂》，期 5/6，頁 15。

徐士杰一針見血道破了理論派的根本弱點。政工樂於辯論，因爲辯論說到底，不過觀念與言說的推演，可以幾乎完全抽離現實。但是言詞理論上的自洽，並不能改變現實，也因此老百姓即使被政工隊員一番言語說得啞口無言，也不會就此心悅誠服。徐士杰的話言簡意賅，不但有實務上的依據，也從論辯與思維框架上挑戰了理論派，頗有一槌定音的效果。眼看這場論戰，就要以實務派在言論與人數上的全面佔優告終，此時，兩名先前保持沉默的政工開口了：

> 馬友勤：照我個人的意見，在今日，一提到「自我教育」這個問題，先得將它的意義根本加以改造；換句話說，即從陳舊的「學優則仕」的觀念一變而為反個人主義及反封建思想的。
>
> 陳翰英：是的，這話我很有同感，自我教育在現時代下的意義，在反個人主義的立場上說，實在含有社會的、團體的乃至民族的防備意義；一切歪曲的誘惑，都將因我們的學習與鍛鍊的深化而無由侵入。
>
> 馬友勤：而且更將顯出對封建制度的高度的破壞性。
>
> 陳翰英：以前聽到有幾位同志說過：「理論是死的。」「到老百姓中間去工作要的是實際」……試問理論不健全，實際將何所依據？如何產生？──我還得說明：所謂，理論乃是理想的表現，理想，是能夠影響到實現的；因此，必須將理想與實現配合起來，而理想是站在第一位的。[122]

馬友勤與陳翰英並不是政工的上級，但由於掌握言說與理論的能力明顯高人一等，無形中躍居爲意見領袖，討論會因而在他們如同講評的發言後戛然而止。兩人的具體主張，由於脫離提升工作效率的目標，其實既不高明，也不重要，重點在於其論理策略與手法。藉由將自我教育拔高到控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高度，爲居於多數的實務派所贊同的平實經驗，顯得無關緊要，回應現實的實用主義作風又一次被壓抑。一、兩位有文化資本的隊員所以能主導多數人討論的方向與結論，乃是因爲在一個重視言說與知識表述能力的知識權力架構中，經

122　〈如何厲行自我教育──紹政工集訓隊小組討論會紀錄〉，《越王魂》，期 5/6，頁 15。

驗與事實恰恰處於卑下的位階，自然在精巧的思辨前顯得庸俗可笑。青年政治運動由是不可能如省政當局所期待，因爲參與者學歷的提升而趨於平實有效，而只會按照辯論的邏輯，不斷在每一次高妙的交鋒中，推向理論容許（而非現實容許）的最極端主張。

當然，未必每一場討論會都出現這樣「藝壓全場」的情形。然而政工生活，及其衍生的論理形式、組織原則，乃至人際互動中的彼此期望，卻是各縣政工隊賴以運作的共同政治基礎設施。這個由自由主義治理性預設組成的政治基礎設施，必然導致了一種適應其條件的青年政治運動。青年政治運動或許不一定親共產黨，也不一定反國民黨，甚至在言談中，一如上述，還會大肆批判個人主義。但由於產生它的種種基本理念預設，它必然帶有自由主義形態自我的個人主義、反建制、反實務特徵，也因此內建對現存政治體制的破壞性。此一政治基礎設施的存在及影響，由政工俞堅（1910-1943）對自我教育的批判建議得到證實。他一方面指出：「個人自由主義與英雄主義」是導致政工隊員厭倦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123]但又認爲埋頭基層「只重實踐不重理論」的「事務主義」，也妨礙了政工隊員的工作成效。爲此，有必要加強自我教育。然而當時流行的自我教育卻往往流於：

> 今日一本政治經濟學，明天又是一冊社會進化史，或者今天讀論文，明天看小說，只想讀得博，不管理解不理解，……每月或每周，每人必須繳卷作文 x 篇，讀書摘記 x 篇，以及閱讀理論書 x 本。[124]

這種囫圇吞棗以求增加書本知識的自我教育，自然對解決工作上的問題鮮有裨益。然而俞堅所能提出的改善辦法，還是政工生活的重複：

> 所謂自我教育，……它首先要根據自己需要研究的問題去收集有關的材料，然後，分門別類，由淺入深的去進行研究。……它必須隨時隨地運用著靈活的技巧可以進行的。譬如工作檢討會，學術研究會，有

123 俞堅，〈政工隊諸問題的意見〉，《前方週報》，期 7，頁 14。
124 俞堅，〈政工隊諸問題的意見〉，《前方週報》，期 7，頁 15。

> 時是確立問題，分組討論；有時是集體研究，個別報告；有時是甲組出題目向乙組挑戰，有時是集體測驗競賽。[125]

無論是從個人自我實現上出發的實踐途徑（自己的需要），將政治等同科學知識（資料、分門別類、研究），還是著重抽象言說的方式（各種討論與辯論會），俞堅可說是全盤接受了自由主義治理性的諸般預設。正因如此，他和許多同代青年始終未曾想到：這些預設才是政工隊及其青年政治諸問題的根源。[126]

最後，從餘姚政工隊的某次座談會，來觀察習以爲常的青年政治預設與實踐，如何在無形之中，瞬間顛倒原有政治階序的情形。

起初，座談會是以縣長林澤與專署政工指導員胡雲翼（1906-1965）彼此問答的方式進行，後在隊員要求下改爲：

> 討論的程序是先由區隊長報告，再由各隊員加以補充，然後大家準對著這報告與補充，加以嚴格的批判，辯論。[127]

一旦主官之間的協商詢答，爲政工隊員熟習的集體討論所取代，會議性質也就由上級對下級工作的指點檢討，演變爲由青年主導自下而上的政治批判。討論的內容雖仍涉及個別政工單位工作的利弊與改進，但作爲一個政治群體，青年政工已反轉受人檢驗的被動處境，巧妙佔據了評斷得失的主導地位，縣長與專署指導員雖是政工隊的領導，實際上卻淪落爲被批判的對象。林澤與胡雲翼未能堅持，或者起先沒有意識到此一後果，就這樣任由政工隊員詮釋其工作困難的因由，順勢導出加強宣傳與改善民眾生活等結論。這些論點重申了青年主張的政工路線。

直到此時，代表上級的胡雲翼終於發言。由於負責三區直屬政工隊的創立組建，胡雲翼可謂是浙江政工的始作俑者。他如此批評：

---

125 俞堅，〈政工隊諸問題的意見〉，《前方週報》，期 7，頁 15。

126 俞堅所論情形具有普遍性，甚至在浙西前線的政工隊，也還是以同樣的方式學習與討論，見，劉廣惠編，《浙西政略商討總紀錄》，頁 112。

127 陸飛，〈政工隊隊員座談會記略〉，《戰鬥》，期 6（1938 年 5 月），頁 8。

> 胡指導員發言了，他說政工隊工作方式必須靈動，所謂工作的靈動問題，不是……用個別式理智上的說服，而是設法製造成一個濃烈的雰圍氣，來激動民眾願意參與抗戰的局面。……所以在這階段上戲劇歌詠還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政治工作主要的還是領導，否則，六十個政工隊隊員，就無法普遍於全縣，因之他不主張像有幾個區隊那樣去做瑣碎的工作，政工隊員最要注意的是去發動當地的優秀份子來組織民眾訓練民眾運用民眾。……健全保甲組織……主要卻不是個別的撤換，而是鼓動鄉民以集體的力量來謀解決。培養民主精神，鍛鍊群眾的制裁力，……差不到〔多〕每個隊員都說到的改善人民生活問題，他說人民生活問題各國亦無法解決，抗戰的中國更無法解決，……對民眾宣傳應強調「抗戰」，不可高調「改善人民生活」。[128]

胡雲翼的論點，很能說明浙江當局創立政工隊的初衷。按其設想，政工隊的主要功能無非以宣傳言語鼓動人民抗戰的熱情，似乎只要產生「濃烈的雰圍氣」，「培養民主精神」，民眾就會以其「制裁力」配合政府。也因此，直接干預地方基層保甲的運作，並不是政工隊的要務。就此而言，胡雲翼的論述與青年政工的思路相互呼應，甚至在激進程度上猶有過之：他們都認爲政治工作應該著眼於理論化的宏大政治敘述（如民族主義與民主），而不當糾纏於「瑣碎」政令的執行細節與成效。他們都假設：強大協調的群體政治力量與秩序，應當而且可能，來自個人自願配合的基礎上。然而這種理想中志願結合形成的政治共同體，其實不是那麼貼合胡雲翼的現實體驗。他雖不正面挑戰青年主流政治論述，卻不得不點破：政治工作主要不是「個別式理智上的說服」，而始終帶有以集體意志與壓力強制個體服從的本質。特別在舉國艱困的抗戰之中，資源分配更難面面俱到，此時一味喚醒個人計算得失的理智，不過凸顯出爲國犧牲之缺少益處，又豈能從無數利害不一的盤算中形成萬眾一心的抗敵共識。有鑑於此，胡雲翼非常坦率地指出，政工宣傳動員的重點，只能放在以非理性的激情

[128] 陸飛，〈政工隊隊員座談會記略〉，《戰鬥》，期 6，頁 9。

凌駕個人得失，使人民見義忘利而投身抗戰；寄望人們出於理智相信「改善人民生活」的許諾，只會使政治工作走上某種經濟主義的死胡同。

胡雲翼這段十分「反動」的言論，立刻引來與會政工隊員的批駁。一位隊員慷慨陳辭：抗戰與改善人民生活，乃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另一位政工隊員則特別提出「討論會多加辯論」。[129]

如同此次座談會過程所顯現，在講究概念推理的討論形式中，「平凡無奇」的切實經驗，很容易爲聽來犀利的批判言詞與姿態所壓制。雄辯如胡雲翼，也難在無人仲裁的言辭交鋒中，僅憑論理令對手心服口服，更何況大部分上級並不熟習口舌上爭勝的技巧。此次座談會一路開至午夜，最後在政工隊員的談笑風生中結束。雖無具體結論，可以確定的是，政治及其話語的主導權，已然不復掌握在林澤與胡雲翼手中。

結　論

政工陳秋濤在集訓時寫下的這段話，也許是青年政治信念的最佳寫照：

> 從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思想以及社會運動上看來，幾乎全是青年人所推動的，當然，我們這裡所說的並不是青年是治人階級的官僚，很明顯的所謂「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主義的實踐，在這一個時代，是被人認為是封建時代「向上爬」的掩護的哲學口號，雖然社會上有很多的「個人主義者」在大喊其「犧牲小我」的人！我們承認青年是純潔的向上的是大公的不是自私的。[130]

足堪玩味的是，作者對「個人主義」的顛倒：將承載集體文化自覺的三不朽理想，視同爲己營謀的小我，而青年於史無稽自以爲是的進步想像與向上追求，反倒理所當然代表大公無私的時代力量。其潛意識的臺詞是：小我無須，也不必爲大公犧牲，因爲成全進步的小我就是實現大公，大公的目標亦在創造進步

[129] 陸飛，〈政工隊隊員座談會記略〉，《戰鬥》，期 6，頁 10。
[130] 陳秋濤，〈內心的話〉，《越王魂》，期 5/6（1939 年 2 月），頁 16。

的小我。陳秋濤所以能信手翻轉既有意義的上下階序，實因其已處在青年政治運動的重力場中，適應「個人自由主義」的運動定律。在青年政治的美麗新世界裡，政治動力來自青年，宛如物理常識，規定了所有政治運動的軌跡。

然而青年政治運動畢竟只是一個論述實踐框架，它不能取代主宰中國現實政治運行的「古典動力學」（現實運作的固有價值規範與邏輯）。從宏觀結構的視野來看，對政權的存續發展而言，爭取青年無疑十分重要。對力求改變現狀的革命政黨來說，出於強烈自由主義自我意識而反建制的青年，無疑是現成的後備大軍。但政治尚有實踐與微觀層面，其運作邏輯與宏觀的結構趨勢未必同步，有時甚至難免存在矛盾。國民黨人的普遍問題在於儘管毫無批判地認同青年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認為這是時勢所趨，卻未能正確認識到，迎合潮流與鞏固政權，即使在理想中的民主社會，也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更何況，青年政治或許在話語上是主流，但在政治實務中，青年只是其中一股社會勢力。他們雖然活躍，但往往不是主導性的力量，一味吹捧青年，鼓動青年，即使得其全力支持，也不一定得到社會多數的認同，甚至可能招來其他群體的反對而得不償失。更有甚者，盲目迎合青年的主張，任其行動，不但不會得到他們的支持，還可能過分提高了他們的期待。這種作為政治舞臺主角的強烈願望，很難在現實中得到充分而持續的滿足，終有幻滅的一刻，屆時青年因期待越高而失望越深，就形成反噬鼓動者的集體怒火。也就是說：以自由主義治理性為底蘊，青年政治運動既是現代革命動員政治之必要條件，卻又是此類政治形態難以有效開展鞏固的內在障礙。由是青年政治運動成為近代中國與世界各政權難以迴避的兩難。

由於歷史加諸其身的限制，大部分國民黨人，終究無法洞察青年政治運動蘊涵的這種兩難困境。或者說，即使有所認識，在既有的自由主義治理性政治基礎設施中，也難以找到克服問題的資源。林樹藝這樣的青年縣長，已代表國民黨應對青年政治運動的最高水平。大學時代的他，即注意到青年日趨苦悶的時代氛圍，以及因此累積的青年政治能量。在深入觀察思考之後，林樹藝已能

敏銳直指青年苦悶的現代性根源（亦即在自由主義治理性的影響下）是人們：

> 生吞活剝地採用西洋新興的文化，如西洋的道德、政治、法律等等的社會制度。[131]

他進而分析：由於教育的資本主義化，學生成爲生產過剩的商品，在仍然是農業社會的中國找不到出路；大家庭制度又在資本主義下式微，青年只能往都市發展，但資本化的都市生活反而使其「個人欲望中的身家欲望」難以實現。最重要的是，中國固有的學術思想，已然浸潤中國政治社會法律制度之中，而成爲一種「尊天命愛好和平」的民族性。然而中國上層與下層社會的一部分，卻接受了西方「功利強權的科學思想」，兩股思潮使學術思想「形成一種五花八門非常混亂的現象」，令「血氣方剛智識未達到相當程度」的青年無所依從：

> 假定青年們要完全本著趨新的精神去迎接西方的思想，或許社會說你過激，而自為叛徒；如果要服從一般社會的標準，被支配於固有的民族特性之下，一定會有人說你是落伍，不適合世界的潮流。[132]

林樹藝八十多年前的分析，竟意外契合王汎森對民國青年煩悶本質的觀察，這說明青年煩悶並未隨主義時代的來臨而完全得到紓解，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勢。綜合其分析與本文發現可知，青年政治兩難的核心是一個意識形態框架劇變的問題。自由主義治理性的文化與制度，固然一時佔據了社會上層的主流論述，深刻重塑了青年自我的價值觀與欲望，可是這一套自由主義本質的論述，既不理解，也不能消滅民族性根柢深厚的政治現實。於是進步青年所追求的世界潮流，注定只能是鏡花水月，但回歸務實又得不到知識菁英的認可，導致他們陷入苦悶與激進的迴圈。

如何應對青年政治運動的兩難？首先，必須對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有徹底的理解，才能動員其中合理的資源，抗衡並修正自由主義治理性。只是在國困民弱的處境下，除了少數識見憑藉不凡的豪傑，一般人很難對自身的文化有發自肺腑的信心，而不免隨波逐流，順從上層主流觀點。林樹藝雖已看到青年苦

131 林樹藝，〈青年的煩悶與社會變遷的失調〉，《學生雜誌》，卷 18 號 2（1931 年 2 月），頁 2。
132 林樹藝，〈青年的煩悶與社會變遷的失調〉，《學生雜誌》，卷 18 號 2，頁 4。

悶的歷史源頭，距離跳脫自由主義治理性只有一步之遙，卻驟然從其最初分析的高度上跌落，最終竟訴諸平庸的樂觀主義，冀望青年苦悶會隨中國社會適應資本主義及其治理性而消解。

數年之後，爲了回應青年苦悶造成的政治衝擊，林樹藝使出了渾身解數：他充分利用官師合一、中國古籍、修養功夫、個人威望等傳統資源，勉力節制青年政治運動的虛妄衝動。若非如此，他將如其他許多浙江縣長，成爲自由主義下的惡人與丑角。[133]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大廈，由於立基於庸俗自由主義與中國政治現實斷層上，遂輕易地爲青年政治累積的能量——憑藉著政工隊的組織——搖撼了。這次短促的能量釋放，並未促使國民黨重新思考其政治基礎。此後，國府一再遭遇了青年造成的政治地震，其意識形態上層建築徹底崩塌，似乎也是不可避免了。就此而言，國民黨黨國體制與青年政治內蘊之自由主義治理性實互相鑿枘，不可簡單套用西方眞理體制／政權（regime）互爲表裡的歷史經驗，而應作爲修正傅柯反一切建制激進理論的重要例證。

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治理性作爲啓蒙現代性的產物，非但未被國民黨國家救亡的需求「壓倒」，反而循著「啓蒙辯證法」的邏輯高歌猛進，並最終在中共的體制中完成了對自身的否定與超越。在政工隊的歷史中，已可看出此一端倪。前面提到的餘姚政工隊，就展示了青年政治的徵象，也暗示了一條出路。在其 96 名正式隊員與 60 餘位義務隊員中，號稱中共黨員曾達 60 多人，據其黨員回憶：

> 黨員定時過嚴格的組織生活，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134]

且不論餘姚政工隊實際上是否與中共存在組織聯繫，這句話不經意地將開展批評、自我批評與嚴格的組織生活聯繫在一起，彷彿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與組織之間，不存在著任何矛盾。如前所述，討論批評是當時浙江政工隊的生活常

133 於樹巒等，〈我怎樣領導政工隊〉，《新力》，卷 5 期 1，頁 32-35。

134 陸學斌、蕭剛、唐偉、陳子方、薛誠，〈抗戰初期的餘姚政工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浙江革命史料特輯（六）》，輯 20，頁 93。林澤，〈摯友郭靜唐〉，收入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編，《郭靜唐紀念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 59。

態，亦是孳生顛覆體制力量的溫床。然而在中共的政治情境中，卻註解著「嚴格的組織生活」。這種看似費解的組合，與其視爲空洞的官方說法，不如說正揭示了中共比國民黨高明之處。如果說政工生活是自由主義治理性的一部分，顯然中共不僅依賴之，利用之，還對之進行去自由主義的改造。由此觀之，中共的成功，絕不僅是更徹底服膺青年政治邏輯那樣簡單。

實際上，中共深刻認識到，迅速擴張政權組織，建立幹部隊伍，固然仰賴青年政治，然而，青年政治對自由主義形態自我的需求也隨之急遽增加，嚴重威脅了政治權威的優位性與穩定性。作家茅盾之女沈霞（1921-1945）在延安的一段日記，正好鮮明地表現出自由主義形態自我個人化的政治視角：

> 我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絕對濃厚的，在對工作的觀點上我也犯了這個毛病。首先總是從個人的可能性出發。這個東西來源是因為自己在家庭中的思想就是主張絕對自由，強調個性的。這個在工作上的個人主義，在現在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利害了，但不能說就完全已是一個集體主義者。[135]

可以看到，初來延安的沈霞與浙江青年政工並無不同，皆從自由主義形態自我的視角，把政治視爲表現個人能力與自由的舞臺，而不是一個貢獻小我的集體事業。中共高層也已注意到問題的普遍性與嚴重性。1941 年，掌管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的馮文彬指出：

> 〔青年〕厭煩這種「鄉村」「瑣碎」「下層」艱苦工作的傾向，直到不安心於自己工作和表示「苦悶」的現象，必須立即加以克服。必須進行教育這些知識青年幹部的工作。[136]

135 沈霞著，鍾桂松整理，《延安四年（1942-194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 42。
136 馮文彬，〈當前各抗日根據地青年運動的基本方向〉，《解放》，期 134（1941），收入權國強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彙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卷 7，頁 525。類似情形參見謝敏，〈抗戰時期「新知識分子」與中共軍隊幹部〉，《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6 期，頁 139-154。

但中共作爲一個矢志顛覆現有政治社會秩序的政黨，比之國民黨，更能放手使用青年政治及其「自由主義」的破壞力量，甚且「以敵爲壑」，將之導向敵方所在的各個領域。

然而，中共在自己地盤內進行政權建設時，就顯現對青年政治防伺甚嚴的一面。在動員青年之際，也以各種看來頗爲嚴酷的論述與手段，打擊自由主義形態自我，此即整風審幹施之於青年學生之實質。1942 年 10 月，主管組織人事的陳雲（1905-1995）聽聞一批青年幹部拒絕受命到東北敵後工作，斷然地處分了違令者，他嚴厲批評道：

> 新知識分子幹部……理想中的革命家是根據過去青年學生運動的經驗，往往高談闊論「政治家」，而現實需要的革命家要會解決軍事、政治、吃飯穿衣問題。……即做各種實際工作；不能只想做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也帶有技術、經驗、事務性，單純的政治工作是沒有的。[137]

不同於國民黨對青年政治諸般預設的盲昧無知或閃閃躲躲，陳雲等中共黨人卻針尖對麥芒，以毫不含糊的態度迎頭痛擊自由主義治理性。中共以黨意壓制青年的「自由意志」，若從自由主義形態自我的理想而言，自是有違人性。若換個角度，中共的作爲，確實有效突破了青年政治的兩難，以嚴格的組織生活，轉化了青年的顛覆性，從而成爲產生強大政治動力的穩定燃料。由於能提出一套不附和青年政治的政治價值體系，中共在重用青年時，依舊能毫不留情地痛加鍾鍊。而身歷磨難的青年，一方面固然爲黨紀所威壓，但另一方面，卻也從集體行動的宏大效能中，體認到自由主義形態自我之有限，而甘願爲實現群體的自由而奮鬥。如此看來，浙江省政工隊的驟起驟落，不過以一種類似電影快轉的方式，展現了國民黨，以至五四以降中國在青年政治大格局下難以跳脫的發展怪圈。而中共這個從新青年中萌生的政治勢力，不僅不受其害，還乘勢而

1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上卷，頁 364。

起，以看似乖戾實則頗具合理性的作爲，利用了中國現代政治的困局，從而成爲青年政治最大的受益方與終結者。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三十年度游擊區各縣室隊編制名額經費標準〉，《新力》，卷 6 期 15，1940 年 2 月，頁 15。
〈各縣政工隊改隸縣政府〉，《碧湖》，號 1，1938 年 11 月，頁 5。
〈如何厲行自我教育——紹政工集訓隊小組討論會紀錄〉，《越王魂》，期 5/6，1939 年 2 月，頁 14-16。
〈武義政工隊第三十八次工作檢討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2，1939 年 9 月，頁 8-10。
〈政工第四區隊自我教育計劃〉，《政工生活》，期 13，1939，頁 13-14。
〈省府指示各縣政工隊念八年度工作方針〉，《碧湖》，號 6，1938 年 12 月，頁 8-10。
〈省政府快郵代電（二十九年一月六日）：電各專員縣長規定各縣政工隊編制與經費標準附發各額表及歲出概算科目式樣電〉，《浙江省政府公報》，第 3197 期，1940 年 1 月，頁 28-31。
〈浙江省各縣政工隊之改進〉，《新力》，卷 3 期 5，1939 年 4 月，頁 11。
〈浙江省各縣政工隊兩年來之成就與改組爲各縣青年服務隊之緣由〉，《新力》，卷 6 期 10，1940 年 6 月，頁 14-15。
〈浙江省第四區十縣政工室副主任政工隊隊長聯席會議特刊〉，《大風》，期 86，1939 年 3 月，頁 2-19。
〈常山政工隊第十次工作討論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10，1939 年 11 月，頁 9-10。
〈湯溪政工隊第五次工作討論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2，1939 年 9 月，頁 11-12。
〈開化政工隊第一次隊員大會及第三次座談會紀錄〉，《新力》，卷 4 期 2，1939 年 9 月，頁 13。
〈黃巖政工隊隊員工作理解測驗結果統計〉，《新力》，卷 5 期 7，1940 年 5 月，頁 15-16。
〈諸暨政工隊六月份工作報告〉，《新力》，卷 4 期 2，1939 年 9 月，頁 5-7。
三區直屬政工隊，〈三區直屬政工隊工作概要〉，《新力》，卷 2 期 2，1938 年 9 月，頁 3-10。
方元民，〈第三區戰時政工隊的發展過程〉，《錢江血潮》，輯 2，1938 年 12 月，頁 37-62。
方元民，〈戰地政工同志之血的教育——第一戰地政工隊被難事件的檢討〉，《錢江血潮》，輯 2，1938，頁 71-75。
幼鷗，〈政工療養室：我們是在怎樣學習著？自我教育一月概況〉，《政工生活》，期 36/37，1939 年 10 月，頁 15-18。
未央等，〈政工隊的地位和任務〉，《新力》，卷 4 期 16，1939 年 12 月，頁 8-11。
余麟，〈政工隊應有的三點基本認識〉，《號角》，期 41，1940 年 3 月，頁 5-7。
吳壽彭，〈政工隊集訓之開始與結束〉，《新力》，卷 2 期 7，1938 年 10 月，頁 9-13。
周立偉，〈三大目的，三大認識，三大希望——林縣長在政工隊集訓時對隊員講詞〉，《戰鬥》，期 18，1938 年 7 月，頁 7-9。

於樹巒等，〈我怎樣領導政工隊〉，《新力》，卷 5 期 1，1940 年 4 月，頁 13-35。
林礽，〈政工隊工作爲什麼會貧乏化？〉，《浙江潮》，期 91，1939 年 12 月，頁 751-755。
林樹藝，〈青年的煩悶與社會變遷的失調〉，《學生雜誌》，卷 18 號 2，1931 年 2 月，頁 1-7。
直屬政治工作隊，〈訪問處屬五縣政工隊報告〉，《新力》，期 15，1938 年 6 月，頁 11-12。
阿楚，〈政工隊和政工隊員的面面觀〉，《龍游民眾》，期 7，1940 年 2 月，第 7-10 版。
侯企之，〈我的受訓生活〉，《浙江政治》，期 8，1940 年 11 月，頁 69-77。
俞堅，〈政工隊諸問題的意見〉，《前方週報》，期 7，1939 年 8 月，頁 14-15。
宣鐵吾，〈宣主任訓詞：服務人員訓練班結訓典禮訓詞〉，《青年動態》，期 9，1940 年 11 月，頁 1-2。
建民，〈由政工隊到服務隊〉，《勝利》，期 90，1940 年 8 月，頁 7。
胡雲翼，〈戰鬥二年來的三區政工隊〉，《戰旗》，期 64/65，1939 年 7 月，頁 20-23。
貞夫，〈對戰時政工隊的一點管見〉，《決勝》，卷 2 期 11，1939 年 5 月，頁 9-10。
郁方，〈晚會——麗水政工隊的工作，學習與生活〉，《新力》，卷 3 期 14，1939 年 6 月，頁 12。
凌潛夫，〈浙江全省政工隊之回顧與前瞻〉，《新力》，卷 2 期 19，1939 年 1 月，頁 15-18。
卿，〈反對摧殘政工隊〉，《戰鬥》，期 100，1940 年 4 月，頁 2。
高宗龍，〈如何改進縣政工隊？〉，《勝利》，號 29，1939 年 5 月，頁 9-10。
曹天風，〈浙江政工隊的總評價及其改造〉，《民族》，期 17，1940 年 6 月，頁 1-5。
莫仲喬，〈第三區戰地政工隊血鬥紀略〉，《錢江血潮》，輯 2，頁 63-70。
陳秋濤，〈內心的話〉，《越王魂》，期 5/6，1939 年 2 月，頁 16。
陸飛，〈政工隊隊員座談會記略〉，《戰鬥》，期 6，1938 年 5 月，頁 8-10。
隊本部，〈一年來的鎮海政工隊〉，收入鎮海縣戰時政治工作隊編印，《鎮海縣戰時政治工作隊成立周年紀念特刊》，1939，頁 11-15。
馮文彬，〈當前各抗日根據地青年運動的基本方向〉，《解放》，期 134，1941，收入權國強編，《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彙編》，卷 7，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 521-526。
黃紹竑，〈今後本省政工隊應有的認識與努力——在全省政工會議閉幕時工作指示〉，《新力》，卷 3 期 26，1939 年 8 月，頁 3。
黃紹竑，〈本省政工隊的回顧與前瞻九月九日對戰時政工隊集訓總隊始業典禮講〉，《浙江潮》，期 27/28，1939，頁 504-507。
黃紹竑，〈本省戰時政治工作人員訓練團戰時青年訓練團及各縣政治工作隊的使命——黃主席在碧湖對政治訓練團及青年訓練團團員訓詞〉，《浙江潮》，期 2，1938 年 3 月，頁 19-22。
黃紹竑，〈政治工作隊之新任務：黃主席一月十五日對浙江省政府直屬各政工大隊訓詞〉，《民族（浙江於潛）》，期 10/11，1940 年 1 月，頁 21-22，19-20。
新野，〈來到浙西之後〉，《新力》，卷 2 期 12，1938 年 11 月，頁 9-11。
楊鎮華，〈政工隊隊員的苦悶〉，《大風》，期 44，1938 年 7 月，頁 3-6。
劉廣惠、孫慶會編，《浙西對敵戰鬥機構與幹部》，於潛：浙西民族文化館，1940。

劉廣惠編，《浙西政略商討總紀錄》，於潛：浙西民族文化館，1940。
劉廣惠講，馬友勤記，〈紹興縣政工隊之歷史的回顧與展望——在集訓大隊的報告〉，《越王魂》，期 5/6，1939 年 2 月，頁 10-13。
蔣萊，〈活躍在錢塘江兩岸的浙江婦女營〉，《婦女生活》，卷 8 期 3，193 年 11 月，頁 9-11。

二、日記、回憶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卷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沈霞著，鍾桂松整理，《延安四年 1942-194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阮毅成，《八十憶述（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林澤，〈郭靜唐和餘姚戰時政治工作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輯 28，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4，頁 86-100。
林澤，〈摯友郭靜唐〉，收入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編，《郭靜唐紀念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 56-73。
姜枝先，〈郭靜唐生平事略〉，《浙江文史資料選輯》，輯 4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 224-225。
孫孑鳴，〈餘姚政工隊的組織情況與活動情況〉，收入餘姚市檔案局（館）編，《抗戰親歷》，北京：中國文化出版社，2017，頁 103-122。
茹管廷，〈國民黨統治時期浙江省民政廳見聞〉，《浙江文史資料選輯》，輯 21，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2，頁 117-131。
張遵文、洪建平，〈活躍在天目山區的抗日救亡團體——浙西行署少年營〉，《杭州文史資料．湖上拾遺》，輯 27，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頁 228-232。
陸學斌、蕭剛、唐偉、陳子方、薛誠，〈抗戰初期的餘姚政工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浙江革命史料特輯（六）》，輯 20，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1，頁 91-122。
黃紹竑，〈我與蔣介石和桂系的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輯 7，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71-118。
黃紹竑，《五十回憶》，下冊，上海：上海世界書局，1945。
楊長嶽主編，《金蕭地區抗日戰爭史長編（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
蔡竹屏，〈寧屬各縣政工隊概況〉，收入《浙江文史資料選輯》，輯 5，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63，頁 82-90。
蔣夢麟，《西潮》，臺北：中華日報出版社，1959。
蕭崗（謝廷齋），〈抗戰初期餘姚黨的建設和群眾工作〉，收入中共貴陽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求索集》，貴陽：編者出版，1995，頁 41-78。
應占先，〈浙江省戰時政治工作隊的建立和演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輯 5，杭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63，頁 56-81。

三、專著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浙江戰時政治工作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從民國八年到民國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Daston, Lorraine,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Hung, Chang-tai.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四、論文及專文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思想史 1》，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 85-137。

王奇生，〈「武主文從」背景下的多重變奏：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政工與黨務〉，《抗日戰爭研究》，2007 年第 4 期，頁 60-82。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爲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頁 21-41。

吳敏超，〈浙東抗日根據地的統戰工作再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8 年第 9 期，頁 21-33。

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爲例的討論〉，《民國史論》，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頁 31-101。

楊煥鵬，〈三青團參與政治及其與浙江各地方政治勢力關係〉，《史學月刊》，2004 年第 3 期，頁 65-70。

楊煥鵬，〈論三青團對浙江地方基層政治的影響〉，《抗日戰爭研究》，2010 年第 3 期，頁 28-40。

錢永祥，《縱欲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裡的政治倫理》，臺北：聯經出版事公司，2001。

謝敏，〈抗戰時期「新知識分子」與中共軍隊幹部〉，《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6 期，頁 139-154。

André Van de Putte（普特）著，劉宗坤譯，〈共和主義自由觀對自由主義自由觀〉，《二十一世紀評論》，總期 54，1999 年 8 月，頁 21-30。

Anderson, Anna Margaret. “The Constitution of Youth: Toward a Genealogy of the Discourse and Government of Youth.” Ph. D. Dissertation, RMIT University, 2010.

Gane, Mike. “Foucault on Governmentality and Liberal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5:7-8 (2008), pp. 353-363.

Gruber, David F. “Foucault’s Critique of the Liberal Individual.”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6:11 (Nov., 1989), pp. 615-621.

The Nature and Dilemma of the Youth Political Movement in Nationalist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Zhejiang County Political Work Squad, 1938-1940

Wang Chen-cheng*

Abstract

The Political Work Squad, a county institution in Zhejiang during World War II, was designed to enlist patriotic youth in the tasks of organizing the peasants into local governments' war efforts. However, due to the framework of the youth political movement, those political workers turned out to be incapable of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Rather, they undermi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local regime. The youth political movement was further affected by the life practices of political workers. As such, the liberal self-imagination overwhelmed realistic political needs. The Nationalist regime eventually lost all possibilities of deploying and controlling the youth.

Keywords: political work squad, youth political movement, selfhood, political workers' lives, liberal governmentality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